

《徐兆璋日記》所見的教育會 與 20 世紀初常熟地方政治

羅皓星

摘 要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向來是熱門的課題。本文以教育會作為此一課題的切入點，探討地方如何因應中央政權的變化而作出調整。由於教育會掌握地方重要的資源，故在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只集中於江蘇一省之教育會。本文以鄰近上海的常熟作為探討對象，透過對1900年以後常熟地區的地方教育會之探討，對於地方菁英如何透過新政收攏地方資源推動建設，並形塑其在地方上的威望，有著更多的認識。士紳通過這些手段，得以在中樞政權不穩之時，成為穩定地方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不過，無論在清朝或民國時期，為進行現代化的建設，地方士紳不可避免地會與既有的地方秩序產生衝突。士紳對地方社會的固有習俗（如迎神賽會等活動）多抱持排斥，惟其亦無法完全取代原有之秩序，只能對其抱持欲拒還迎的態度。士紳利用近代國家體制的外形，以延續自身在地方政治的角色，是為觀察近代中國國家與地方關係的切入點。

關鍵字：常熟、教育會、徐兆璋、地方政治

Loc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Diary of Xu Zhao-wei and the Changshu Society in Early 20th Century

Ho-sing Law^{*}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gions has long been a meaningful issu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r many researchers, including the present author, who attempts to bring some new ideas to bear on it. It is based on the Diary of the Changshu elite Xu Zhao-wei (1867-1940), by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such local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From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forming of any education association could help the modern state to infiltrate into the life of local society. From the eye of Xu Zhao-wei, it could be showed that the following issues were involve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ow did the local elite face this tremendous change in Qing society? During the belated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olicies (Xinzheng, 新政), how did the local elite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and power in local societies such as Changshu?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consideration,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s) and local elite (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could only have brought about some but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local society.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point that the elites could handle the original norms of their local societies in semblance of the modern state.

Keywords: Changshu, education association, Xu Zhao-wei, local politic

^{*}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徐兆璋日記》所見的教育會 與 20 世紀初常熟地方政治*

羅皓星**

壹、前言

在 20 世紀的中國史研究中，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是熱門課題。在此課題中，士紳的角色甚為關鍵。¹ 不過，受限於研究條件還不成熟，致使學界對此問題的認識往往流於表面，無法對晚清以來地方社會的狀況有所瞭解。隨著許多資料陸續公開，提供更為札實的史料基礎，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開始注意到士紳在地方社會中的多樣面向。² 其後有學者修正其說法，認為地方士紳有可能因為政治社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近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工作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主辦，2014 年 11 月 24 日），得蒙評論人金賢貞、村田雄二郎、川島真、小野寺史郎、藍適齊、劉祥光等教授提供意見。投稿過程中，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提點，在此特向以上人士表達謝意。最後亦感謝羅士傑教授促成此文之寫作。

收稿日期：2015 年 7 月 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5 年 11 月 16 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¹ 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

² Mary Backus Rankin 與 Joseph W. Esherick 在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一書序言中，曾回顧以往美國史學界對於地方紳士的研究成果。這篇導論回顧了過去學界對地方菁英的研究歷程。該書的其他文章則說明了清末民初各省地方菁英的轉型歷程，並呈現地方菁英並非鐵板一塊，而有各式各樣的型態。從地方網絡（arena，可以是一個地理區或一個人群網絡）分析地方菁英的方向，也確立地方菁英不只是取得科舉的士紳，而是更多樣的人群，包含士紳、商人、軍人與社區領導人。見 Mary Backus Rankin, Joseph W. Esherick, 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4.

會的變動，而使其地位受到影響。³ 然而，要如何掌握地方士紳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呢？在舊有中樞政權崩潰、新秩序尚未穩定之時，地方士紳又是如何操縱地方事務呢？這些問題若無法配合田野調查，對於地區士紳如何操作政治的過程進行研究，實難以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觀點。本研究雖欠缺田野調查作為研究基礎，只能以地方文獻的角度分析地方政治的運作狀況。但是，本研究希望藉由地方文獻，探討教育會在地方的建立過程，對於地方士紳在近代國家體制進入地方社會以後如何操作政治，提供一種具有說服力的解釋。而本文所倚重的主要文獻為常熟士紳徐兆瑋的日記，以此作為地方文獻的視野。

近年來，散佚在各地的日記材料的出版為研究者提供研究地方士人與社會的機會。羅志田首先運用劉大鵬《退想齋日記》，以觀察四民社會解體前的一些現象。⁴ Henrietta Harrison 在《夢醒子》一書中，亦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為主要材料，嘗試提出在現代化過程之中，地方鄉村一般老百姓所面對的處境。⁵ 關曉紅則綜合朱峙三與劉大鵬兩位鄉村士人的日記，以探討年齡、取向各異的鄉村士子面對社會變動的心路歷程與現實際遇。⁶ 小野寺史郎則對上海圖書館所藏王清穆《農隱廬日記》進行梳理，意圖探討民國前期江南士紳的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⁷ 由此可見，近來學界運用日記來描寫地方士紳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已蔚為

³ David Faure, Helen F. Siu,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11.

⁴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社會變遷〉，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61-190。

⁵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⁶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⁷ 可參見小野寺史郎，〈地方史研究と王清穆日記〉，收入高田幸男、大澤肇編，《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口述・電子化・地方文獻》（東京：東方書店，2010年），頁219-247；小野寺史郎，〈王清穆『農隱廬日記』に見る民國前期の江南士紳〉，收入森時彦編，《長江流域社会の歴史景観》（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年），頁145-168。小野寺史郎對於王清穆日記的整理成果，可參見王清穆研究會編注，〈王清穆『農隱廬日記』〉，《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4號（2012年），頁35-102；王清穆研究會編注，〈王清穆『農隱廬日記』(2)〉，《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5號（2013年），頁45-114；王清穆研究會編注，〈王清穆『農隱廬日記』(3)〉，《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6號（2014年），頁59-90；王清穆研究會編注，〈王清穆『農隱廬日記』(4)〉，《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7號

風潮。

因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徐兆瑋日記》⁸為主要史料，配合上海圖書館所收藏之地方文獻（如丁祖蔭之著作與日記），輔以《重修常昭合志》⁹、當地的報刊等材料，對於地方士紳如何透過新式教育來參與地方政治進行瞭解。選用《徐兆瑋日記》之原因，在於他對常熟地方事務有著詳細記載。與長期作為常熟地方政治第一人的丁祖蔭¹⁰日記相比較，訊息更為豐富。透過《徐兆瑋日記》的描述，有助於瞭解以下問題：士紳們如何結合舊有的地方資源與新政的種種措施，進而形成民國初期常熟地方的統治結構。透過研究可以看出：在這過程中，與其說是新與舊之間的衝突，不如說是地方的既有秩序如何在近代國家的外形下繼續生存。士紳們又是如何與近代國家體制取得妥協，以保持其在地方社會上之地位，而不受近代化過程中的衝擊與影響。

以往學界對於江浙地區現代化的研究中，教育是受關注之重點。不過，學界研究之重點大都只到省級教育會。¹¹ 蔣維喬（1873-1958）回憶他在江蘇省教育

（2015 年），頁 41-98。

⁸ 徐兆瑋（1867-1940），字少遠，號倚虹，又號虹隱，別署劍心，江蘇省常熟縣鄉何市鎮人。1890（光緒 16）年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等職。1907（光緒 33）年，赴日本學習法政。1912（民國元）年與瞿啟甲等當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員。創議設立常熟縣圖書館。抗戰期間流徙無錫等地，後遷居上海，1940 年在上海去世。《徐兆瑋日記》內容豐富，可說是清末民初以常熟為中心輻射周邊的地域性百科全書。就內容而言，日記中只要涉及他與親朋好友的來往信笈，書信內容就會被無一遺漏地抄寫在日記裡。因此，從其日記之中實可看到徐兆瑋本人與地方士紳之間的關係。在其書信之往來中，亦可得見士紳如何思考與處理地方事務。通過此認識能對地方士紳在地區如何運作地方事務，有著更多的認識。佐藤仁史教授亦有注意到此書之史料價值，可參見〈近代中国の地方文献についての覚書〉，收錄於「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http://ricas.ioc.u-tokyo.ac.jp/asj/html/037.html>（2014/8/21 點閱）。

⁹ 《重修常昭合志》由張鏡寰修纂，在民國年間曾多次進行修訂。本文所使用之版本為 1946 年補纂修本。參看徐復、季文通主編，《江蘇舊方志提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48-349。惟按照〈輯印經過〉所述完成時間為 1948（民國 37）年。

¹⁰ 丁祖蔭（1871-1930），字芝孫，號初我、初園。江蘇常熟人。辛亥革命後歷任常熟、吳江縣長。晚年移住吳縣。曾就讀江陰南菁書院，長期致力於地方教育、財政、公益事業。

¹¹ 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頁 230-233。

廳工作的經歷時，提到江蘇省教育會為省內三大勢力之一。¹² 有人則把江蘇省教育會視為「學閥」，並認為其權勢之坐大，乃因江蘇「地位與物產之關係」所造成。¹³ 從當時人的評論看來，教育會具有強烈的地域特性。

就以往的研究而言，教育會在清末中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史料上來看，教育會大多由德高望重者主持，地方官吏對其作為予以重視。¹⁴ 因此，教育會作為一股集結地方士紳勢力的力量，對於地方事務產生重大的影響。既有的教育會研究集中在江蘇教育總會，¹⁵ 這些研究忽略縣級的教育會，而且仍以現代化的角度看待士紳在地方上的角色。如高田幸男以無錫為例，探討教育會在清末至抗戰前的發展過程，試圖說明近代教育制度如何經由教育會作為媒介進入地方社會，並提出「上海型教育會」的概念。高田認為，在 1920 年代以前，無錫教育會仍由地方士紳所把持，直至北伐以後，教育會的成員才有所改變。¹⁶ 教育會是作為分配地方資源的一個重要機構。所以，對於教育會所象徵的權力網絡作出更細緻之研究，實有其必要。

近年來，有學者對於地方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朝倉美香在其探討清末民國地方義務教育的研究中，就注意到士紳如何運用廟產與家族財產來經

¹² 蔣維喬，《江蘇教育廳三年的回憶》，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書，無頁碼。

¹³ 「江蘇大部分——幾乎可以說全部分——的學校及一切教育機關，都成了他們的地盤，而且盤據得非常堅固，已經不容其他勢力之侵入。」見華貞，〈江蘇學閥之過去及將來〉，《中國青年》，第 6 卷第 7、8 期合刊（1926 年 8 月 31 日），頁 167-176。

¹⁴ 就溫州為例，擔任教育會會長一職的孫詒讓死後，官員親自至其他有力士紳家中請其接任會長一職。該士紳因此職「為地方義務攸關，強許暫代」。見〈要聞：溫州教育會總理易人〉，《神州日報》，1908 年 7 月 9 日，頁 3。從此例可見教育會在地方所扮演之角色。

¹⁵ 高田幸男以《江蘇學務（教育）文牘》為主要材料，探討江蘇學務總會轉型為教育總會的過程。他指出學務總會是基於張謇對地方自治的構想而形成的。見高田幸男，〈江蘇教育總會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駿台史学》，第 103 號（1998 年 3 月），頁 1-29。陳昀秀的研究指出：江蘇教育總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民間教育團體，從事的活動與整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皆有所牽連，彼此相互交織。見陳昀秀，《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另外，亦有論者強調教育會與「蘇人治蘇」的連結，見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¹⁶ 高田幸男，〈清末江蘇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構築と教育会——江蘇教育總會による地域エリートの「改造」——〉，《駿台史学》，第 111 號（2001 年 2 月），頁 37-62。

營新式學堂。¹⁷ 徐佳貴則以浙江瑞公縣中學堂說明晚清教育改革中地方士紳所發揮之重要作用。他認為在新政推動過程中，士紳和國家是可以透過「正和博弈」以達至雙方得利的結果。¹⁸ 兩人的研究對象雖有所不同，然而都注意到教育機關在地方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亦使得研究者在看待新式教育在 1900 年代以來地方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能有不同的視野。

所以，研究新式教育在地方社會的拓展過程，可以看到地方士紳如何因應新政的開展，而調整出新的「遊戲規則」。田中比呂志注意到透過新式教育在地方的推展，進而作為士紳參與地域政治的有力契機。¹⁹ 又如同佐藤仁史所言，「城鄉對立」即在鄉菁英通過各種自治團體來對抗國家，以穩固自己在地方上的位置。²⁰ 因此，觀察地方士紳在政權變易之際如何在新的規範下取得生存空間，有助於理解江南地方社會的地方政治，提供不一樣的認識。

貳、徐兆璋與晚清時期的常熟

常熟，古稱虞。其地理位置「位於江南與蘇、崑、澄、錫接壤，土地肥沃，宜於農業。歷年以來，鮮遭災害。故經濟富裕，地方安定，社會組織井然而

¹⁷ 朝倉美香指出：地方士紳經過培訓以後，即可作為教育行政的負責人，得以向老百姓徵收教育稅，以為建設地方學堂經費之主要來源。教育稅的徵收，實有利於小學堂與地方自治的同時並行。這樣士紳的地方策略必須做出改變。她提出：若無法以教育稅充作經費來源，則學堂經費仍以傳統教育機關的資產家族的財產為來源。縣教育行政機關通常以教育稅為運營經費，大部分小學堂由於經費不足，只能以傳統的塾祠權充為校舍。在廣東一省，亦有地域的差異。例如在工商業興盛的地區，士紳們能以教育稅全部充作小學堂經費；而在宗族勢力較強的地方，則利用宗教方面的奉獻來支付小學堂的經費。參見朝倉美香，《清末・民国期鄉村における義務教育実施過程に関する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5 年）。

¹⁸ 徐佳貴，〈晚清士紳與清末地方興學中的國家與社會——以浙江瑞安縣公立中學堂存廢之爭為例的考察〉，收入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01-232。

¹⁹ 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統合と地域社会：立憲・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東京：研文出版，2010 年），頁 101。

²⁰ 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東京：研文出版，2013 年）。

秩。」²¹自明清以來，因農業經濟的成長而逐漸成為常熟、昭文兩縣。1930 年代國民政府的調查報告中，對於常熟的地形有以下記載：

西北高而東南低，天旱則東南豐收，天雨則西北豐獲，故有常熟之諺。此農產之優勢。再以軍事言，東瞰江海，為揚子江入海之口；南連吳會，可以勾連江浙。尤要者，東北之福山與南通之狼山，隔江相對，為軍家必爭之地；又以居江南之腹部，其一得一失，可以影響江南全部。²²

故此常熟因其地理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曾攻打常熟，並占領兩年之久，對於當地造成嚴重破壞，²³也打擊了常熟地區的文教風氣。惟對於經濟發展則影響不大。²⁴因其地利之便，自常熟至上海等地甚為便利。²⁵在《徐兆璋日記》中，可見到徐兆璋經常前往上海購買書籍、參與學會等。²⁶徐兆璋接觸到不少新資訊，在各種學問知識的閱讀與接收均有其優勢，²⁷對於當時言論界的一些現象，也有其獨特之觀察。²⁸徐兆璋憑著對國內外訊息的

²¹ 《常熟縣史地政治經濟社會概況總報告》，收入南京圖書館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情調查報告》，第 9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頁 43。

²² 《常熟縣史地政治經濟社會概況總報告》，收入南京圖書館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情調查報告》，第 94 冊，頁 44。

²³ 「咸豐十年八月初二癸亥日，常熟城陷，為賊據者兩年餘。」見常熟譚嘯雲，〈守虞日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 5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12。

²⁴ 劉石吉指出江寧、鎮江、常州等地所受破壞最為嚴重，蘇州等地次之。而浙西與蘇州等地更能在亂後復元，其繁榮不亞於太平軍起事前。見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07。

²⁵ 「晨，至小東門外乘昆山輪至滬。常熟至昆山須四時半，沿途趁客以是稽遲，然滬寧三次車決不失期也，且用鐵路聯票，甚便捷。」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合肥：黃山書社，2013 年），第 2 冊，1910 年 4 月 21 日日記，頁 1077。

²⁶ 「得師鄭二月十五日書，托余在滬上購物，並欲購甲辰《新民叢報》一分。」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4 月 3 日日記，頁 478。

²⁷ 「閱書，曾根俊虎《粵軍志》一冊。中國官書多粉飾，不無諱敗為勝之處。此書出自異邦人之手，疑若可徵信矣，然亦多齟齬不合處。」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4 月 1 日日記，頁 477；「讀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年譜》一卷。此書滬上所購。康南海亦出先生門，疑其論說多守師說。」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6 月 7 日日記，頁 493。

²⁸ 「梁任公之倡《新民叢報》也，明知《清議報》談鋒逼人太甚，故歛其芒，出之以和平，而我中國守舊迂謬之儒同聲贊美，不脛而走，滬上行銷幾及萬本，村塾僻陋亦置一編，任公之心思真不可及。」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2 年 9 月 16

掌握，對政治局勢有著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常熟有再陷入戰亂的危機。1899 年時，他如此評論時事：

近來時事日非一日，將來之禍，不為土崩，必為魚爛。吾鄉之變當在四、五年，以地居江海沖衢，彼族兵力可以先及也。鄙人策之當在西伯利亞鐵路告成之後。嗣後俄、德據北，英、日割南，而天下無寧宇，左社之變當不遠也。²⁹

在義和團事變期間，常熟一地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其時徐兆瑋人在上海，曾聽聞「市中謠傳甚多，或云虞城諸錢莊於初一晚收市，或云申江避地入內者絡繹，或云各處天主堂皆將十字架取去，恐土匪乘隙肆虐也。」³⁰且「城中錢市依然閉塞，市面衰敗已極，因之謠言蜂起，並有自初十日起城門午開酉閉之說。」³¹人心浮動之時，民變屢起，在常熟一地亦不例外。他從友人口中得知「支塘、窑鎮一帶佃戶聚眾滋鬧，拆毀催頭房屋數家」，「又拆毀項橋催頭陸燮堂一家。此輩本屬冥頑無知，藉抗租之名，意在搶劫富戶。探悉集眾在窑鎮斷港廟投筊於神前而後出，附近殆近千人。」³²通過閱讀《申報》等刊物，使其能分辨流言真偽。³³隨著形勢的惡化，地方治安愈加不靖。盜賊出沒之事時有所聞。³⁴地方士紳組成

日日記，頁 388。

²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899 年 4 月 16 日日記，頁 52。

³⁰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6 月 29 日日記，頁 178。

³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8 月 3 日日記，頁 192。

³²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12 月 20 日日記，頁 240。
1842 年在常熟地區亦出現類似的民變事件，可參見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0-12。

³³ 「《申報》所登教皇索償一節，又據《西字報》云：教士所損身家性命皆未核實開報，將來教皇未必有索償之事。可見流傳之言不足為據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9 月 22 日日記，頁 206。

³⁴ 「敝鄉幫匪日多，十二月中，常熟西鄉連出盜匪四五起，皆此輩中人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3 年 1 月 30 日日記，頁 408；「惟聞梟匪猖獗，日甚一日，劫人勒贖，無所不至。」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3 年 7 月 5 日日記，頁 429。而比起革命黨，徐兆瑋對於劫匪更為懼怕。他曾謂：「革命風潮甚巨，但壓於外權，章、鄒依然逍遙法外。國勢積弱，何苦以空言為網羅，徒令豎子成名？鄒容僅弱冠，且不必通同，此之刊《革命軍》全是小兒脾氣；章則怪僻性成，書生造反，終究不成，斷不如梟匪之可畏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3 年 8 月 18 日日記，頁 436。

團練，作為護衛地方之武力。為維持團防的支出，得要從地方經費中抽取部分稅捐以為運作經費。³⁵為此，地方官吏亦設法籌集財源。³⁶

隨著學堂在各地方的推行，加上地方財政吃緊。士紳要如何調整地方策略，以進行地方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 1907（光緒 33）年學部對江蘇省所作的調查中，常熟縣共有 14 間學堂 409 名學生、昭文縣有 12 間學堂 286 名學生。³⁷可見在當地士紳的推動下，實有長足之進步。他們為何要參與新式教育的推行呢？在《重修常昭合志》中的說法為：

光緒戊戌以後，科舉垂廢、學校遞興；五、六年間，政變迭作，教育政令亦旋作旋輟；而邑中志士，鑒於時勢之急，教育之不容緩，相與斥私財、尚公義，先後創設小學，以為作育人才。³⁸

就表面上而言，常熟地方士紳呈現一股合力振作地方新風氣的景象。不過，當時地方社會的生態，顯然與《重修常昭合志》的記載不盡相同。

在實施新學制以前，就有士紳希望能以米捐等地方稅收作為學堂之常年經費。³⁹徐兆瑋與其友人張鴻⁴⁰曾「議設看報會於公祠，又議擴充中西學堂」，並謂「恩科並試，則賓興有閒款可撥，以之開辦學堂，是實正理。」⁴¹徐兆瑋本人熱中

³⁵ 「龐伯深來，……詢米捐事，則云各得四成，米商撥一成修神廟，官撥一成作團防經費云。」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11 月 4 日日記，頁 335。

³⁶ 「常熟楊大令於書院街捉得賭客數人，每人罰鍰以充團防經費，索七人，洋一千元，紳董說情，許減半。一時聞者心栗，君謙亦作牧豬奴戲，遽令撤去。予戲謂今人羞惡之心漸減已盡，惟視錢刀如性命，大令其深知隱衷哉！」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3 月 19 日日記，頁 277。

³⁷ 〈江蘇省普通學堂學生統計表〉，收入學部總務司編，《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年），頁 6。

³⁸ 《重修常昭合志》（常熟圖書館藏 1948 年刊本），第 9 卷，〈學校志·學堂〉，頁 36b。

³⁹ 「孫紳國楨等又稟請，以此項〔米捐〕為常、昭學堂長年經費。」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7 月 5 日日記，頁 307。

⁴⁰ 張鴻（1867-1941），初名澈，字映南，號橘隱、蠻公、燕穀老人等。1904（光緒 30）年進士，歷官內閣中書、戶部主事、外務部郎中，記名御史，駐日本長崎、神戶及朝鮮仁川領事等。民國以後回鄉從事教育事業。

⁴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5 月 27 日日記，頁 298。

於興辦學堂，卻受到其他士紳之攻擊，如「龐綱堂因《同文滬報》登來函，言學堂為養漢奸之地，是端、剛唾餘，龐某系其羽翼，故尊奉不失墜云云。」⁴² 雖然面對種種困難，惟因徐兆瑋聽聞「朝廷有立憲法、廢科舉之議，不日可下旨矣。將來地方自治款項須一一清厘，城紳未必能常行其保守主義。」⁴³ 因此，他曾如此分析在學堂研讀學問之利弊：

惟地方材〔財〕力只有此數，學堂規模似不必闊大，教習自本年秋季始請一人足矣，何必空有教習之名，虛糜經費，反使貧家子弟不能沾實惠乎？似此光景，學堂不如義塾多多矣。鄙見首改學堂，仍不失義塾本意，似為得中，否則無益有損，提供一二人之膳脩，俾地方材為俱窮，甚無謂也。⁴⁴

經過幾年的觀察以後，他對新式學堂有更深入的分析：

學堂中既習科學，則中學不免拋荒，然不可不略知大義，如經學源流、史學源流、歷代制度、地理沿革等類，若胸中空諸所有，則一詰問而立窮矣。予年十九始從事實學，二十年中無日不孜孜向學，以此雖陋劣，幸不為時流所棄。汝正青年，此數年中可增無窮知識。學部考試新章中學亦問經、史大義，且束書不觀，全憑記憶，較舊時科舉難更倍蓰。⁴⁵

從上述兩段文字，可以看到徐兆瑋對新式學堂與科舉制度的評論。就他而言，學堂的經營成本比科舉來得高，故「較舊時科舉難更倍蓰」。從日記亦可看到他意識到辦學堂所面對的財政問題。他曾在寫給常熟縣令的信中謂：

近晤敝鄉諸紳董，盛道執事拳拳以興學為亟，益殷愿見之忱。惟是敝鄉學務一苦於絀公款，二苦於乏師資。統計虞東大小二十餘鎮，創立小學堂者不及十分之三四，然猶苟且陋略不中程度，此不足為辦事諸君病，財力實有以限之也。⁴⁶

⁴²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9 月 6 日日記，頁 324。

⁴³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8 月 16 日日記，頁 525。

⁴⁴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3 年 8 月 21 日日記，頁 437。

⁴⁵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4 月 12 日日記，頁 621-622。

⁴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10 月 17 日日記，頁 546。

因此，他致力於開拓財源，以為興辦教育之用。在此過程中，士紳仍得運用地方的固有規範，以為應對之法。

叁、新政初期的常熟

隨著 1905 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地方教育制度有必要進行重整。最大之改變在於裁撤學政，改為設置提學使司。此標誌著省級地方教育行政體制的轉變，對清末教育的統籌發展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⁴⁷ 對於這種變化，徐兆瑋認為「科舉一停，人知學會之可謀保舉也，是者居多數，非者居少數，亦不問可知。大抵翰林與科舉有密切之關係，學會與學堂只變換之名目。不停科舉，學會斷難恢張。」⁴⁸ 隨著新政的展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士紳均不得不配合。⁴⁹ 因為不通過新的「規則」，實無法參與地方事務。所以，新式教育機構成為士紳極欲進入之目標。勸學所和教育會則成為地方新式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環。

在 1906（光緒 32）年頒布的「學部奏定勸學所章程」中，勸學所由地方官監督，是為「全境學務之總匯」。勸學所設總董與勸學員各 1 人，「總董由縣視學兼充，勸學員由總董選擇本區土著之紳衿品行端正、夙能留心學務者」。勸學員之職責為「於本管區內調查籌款興學事項」，並與總董「擬定辦法，勸令各村董事切實舉辦」。勸學員「平時宜聯合各家及本村學董」，勸適齡子弟進入學堂。他們通過勸學、興學等工作以鼓動學堂在地方的開展，並負有籌款、開風氣、去阻力的任務。勸學員亦應在所轄地區內「繪成總分各圖，注明某地有學堂幾處，各學堂若干齋堂」，向勸學所報告。勸學所每半年向地方衙門呈交表冊，以為紀錄。總董則負責宣講所之各項事務，如延訪宣講員以負責宣講事宜。其宣講內容以「學部頒行宣講各書，及國民教育、修身、歷史、地理、格致等淺近事理，以迄白話

⁴⁷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08-109。

⁴⁸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8 月 19 日日記，頁 526-527。

⁴⁹ 「戊戌之變，人多議其太驟，然驟固難變，遲亦難變，與其遲也寧驟。即以吾虞邑論，士大夫中除映南、孟樸、小川諸君外，有一可與談變法者乎？至於講求新法，更無一人，皆是口頭禪耳。」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10 月 5 日日記，頁 329-330。

新聞」為主。⁵⁰

同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第一條中，則說明教育會之宗旨為「期於補助教育行政、圖教育之普及、應與學務公所及勸學所聯絡一氣」。教育會設有會長、副會長、會員、書記與會計、名譽會員等 5 職務。教育會所經營之事務為：一、設立教育研究會，以求增進學識；二、設立師範傳習所；三、調查境內官立私立各種學堂後開事項；四、籌設圖書館、教育品陳列館及教育品製造所，並搜集教育標本，刊行有關教育之書報等，以益學界。⁵¹ 勸學所與教育會的關係，皆為實行新政前後所設立之教育機關。勸學所的角色類似於立法機關，教育會則有行政機關的意味。勸學所掌握財政權，教育會則在人數上具有優勢。有研究指出：勸學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地方自治的平臺。⁵² 就常熟而言，無論是勸學所或教育會的主要成員，往往都是地方自治的有力推動者。因此，教育會等教育機關亦漸漸成為士紳交流地方事務的重要平臺。

就常熟而言，新式教育的推動頗為順利。1905 年設立常昭學務公所，1907 年改設為常昭教育所。其時，丁祖蔭與殷樹森接受提學使的委任，就任總董。勸學所成立後，將常熟、昭文兩縣劃分為 15 個學區，各學區設勸學員，分管學區內勸導辦學和社會宣教事宜。直至 1910 年，常熟、昭文兩縣城鄉共劃定 35 個市鄉，並形成縣（勸學所）、學區（勸學員）和市鄉（學董）三級管理體制。⁵³ 其時，丁祖蔭在一篇文章中，對於教育與新政的關係有以下的看法：

九年預備之期，忽忽年有半矣。憲政進行之機，純視乎教育一脈之助長。吾江蘇固萌動最早，吾常昭又文學優異之鄉也。按憲政預備之順序，識字義之國民，七年中當占百分之一八年倍之、九年又四倍之。常昭學生一千六百三十與人口上年統計六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五人之比較，僅四百分之一耳。本年與去年之比較增進之學生數，僅四分之一

⁵⁰ 〈專件：學部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四川官報》，第 20 冊（1906 年），頁 64-68。

⁵¹ 〈奏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摺〉，收入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第 1 冊，頁 430-433。

⁵² 高俊，《清末勸學所研究：以寶山縣為中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頁 195。

⁵³ 常熟市文化局編，《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頁 375。

耳。循是以推，教育普及當期之十四年以後，胡以視後此七年有半之期限也。九年之預備不完，竊恐地方自治之基未立，而教育之本已先撥也。嗚呼！教育之宗旨不明，日日言籌款，日日言勸學，終百難而無一當。蓋教育非者國民之教育，非人才之教育也。義務之教育也，非權利之教育也。⁵⁴

與此同時，常熟當地的地方教育會也相繼成立。就常熟地區而言，1904 年丁祖蔭、曾樸等人成立常昭學會。1906 年，經江蘇提學使批准後改組為常昭教育會，以普及教育為宗旨。教育會設正、副會長各 1 名，並設有評議員 20 名。其職責為倡辦學堂、勸辦地方興學等。1909 年，創立《常昭月報》以為其機關刊物，內容以學務、地方公益為主。⁵⁵《重修常昭合志》對於常熟教育會創立初期的歷史有以下的描寫：

教育會設於寺前街子公祠，始名常昭學會。光緒三十一年與吳江、崑山各縣同時成立。會設會長一員、副會長一員、評議幹事若干員，均由會員投票選舉之。三十二年八月，遵章改組教育會。自學會成立後五年，歷選丁祖蔭為會長。宣統元年間，殷崇光、俞鍾鑒繼之。會中籌辦師範傳習所、民立兩等小學、競化兩等女學，各校均由會員提倡，或一二人捐資設立，並按月分赴各鄉巡迴。宣講風氣，由此漸開。數年間學校遍於四境矣。⁵⁶

不過，《重修常昭合志》所陳述的「沿革」，與《徐兆瑋日記》所言不盡相同。在日記上看來：在教育會創立以前，存在兩派士紳：一派以丁祖蔭等人為首；一派以潘毅遠、季似谷為首（《徐兆瑋日記》中稱其為「城南黨」）。在丁祖蔭一方而言，1899 年就與曾樸、徐念慈等人合作興辦塔前小學。⁵⁷此時，為搶奪小學之經費與

⁵⁴ 丁祖蔭，〈常昭勸學所教育會文牘序（乙酉）〉，收入《丁初我雜著》（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館稿本），原稿無頁碼。

⁵⁵ 其介紹可參看章開沅，《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頁 267-271。

⁵⁶ 《重修常昭合志》，第 9 卷，〈學校志·學堂〉，頁 36a-36b。

⁵⁷ 《重修常昭合志》對於塔前小學的沿革有以下的說明：「塔前高等小學，邑人丁祖蔭、潘任、季亮時等於光緒二十三年間集合同志，創設中西學社於城東學愛精廬，旋由昭文知縣李鵬飛撥給別峰菴為社廬，並以捐款改建藏書樓，度置圖籍，以供學者肄講。次年增設蒙學一所，發起人自任教授者。兩年餘，旋併學社改為中西學堂，推廣校舍，規模粗具。曾

其他士紳產生衝突，使得曾樸不得不遠離常熟來到上海。⁵⁸ 有研究曾以「傳統」與「新」來區分其特性，⁵⁹ 惟若細心分析各自之經歷，則能看到地方士紳特質之複雜性，不能以單一性質來加以區分。⁶⁰

在丁祖蔭的《丁初我日記》中，對於教育會有諸多記載。如他曾提議「整齊學級、規畫學區」，過程中「稍有衝突，卒以通過」；⁶¹ 並「決議中學預科正名為高等小學，別設立區初等小學」。⁶² 丁祖蔭就任教育會會長時，亦在日記中詳列教育會之開會事項。在日記中，對於教育會的實際運作亦有所理解。⁶³

面對不一樣的遊戲規則，士紳們的策略亦要作出調整。在徐兆瑋來說，廢除科舉制度對其生涯規劃有很大之影響。建立學堂成為地方士人參與地方事務的新方式。徐兆瑋對此有自己的看法：

徒言辦學堂而無地方自治之權，何時可以辦妥？又，紳士有公正者，有畸邪者，兩黨相爭，國民自從公正，亦未見畸邪之必勝也。總之，此制立後，必搗亂一二年，然後可治。尤須慎選地方官，然後能擇賢明之紳士。官與紳相輔，地方焉有不治者乎？⁶⁴

樸、張鴻輩相與助其成。二十八年又改稱常昭公立高等小學，後因石梅改辦高等小學，別以東校二字。宣統三年，變更舊制建築，校舍較為完備，學社經費由發起人募集。學校經費，歲撥許浦魚，籌捐錢三百千文、水利公產租息銀六百圓及米捐款充之。自開辦至國變十四年間，由主辦人獨力支持，歲有捐墊學生年漸擴充。畢業者六十人以上。是校為吾邑學校開辦之始基也。」見《重修常昭合志》，第 9 卷，〈學校志·學堂〉，頁 36b-37a。

⁵⁸ 虛白，〈曾孟樸先生年譜（中）〉，《宇宙風》，1935 年第 3 期（1935 年 10 月），頁 164。

⁵⁹ 鄧若華，〈現代化過程中的地方精英轉型——以 20 世紀前半期江蘇常熟為個案的考察〉，收入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 6 輯：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55-193。

⁶⁰ 關於常熟士紳之間的路線之爭問題，當有另文探討。

⁶¹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館藏稿本），光緒 33 年正月 13 日日記。

⁶²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光緒 33 年 6 月初 2 日日記。

⁶³ 「教育會開常年大會。三時會員齊集。祖蔭報告：（一）添舉宣講員（各人擔任）；（二）繼續宣講所方法（函告勸學員實行）；（三）設立小學教員研究會（於日內發起）；（四）實行勸學（於月內開勸學員會籌議，並決定勸學員一年一任，三次不到會者，解職）；潘毅遠提議雜誌發行（歸評議員會復議）；屈荊才提議勸學所與教育會合同行事之方法（勸學所執行事件，當由教育會決議）……五時散會全體攝影於西校操場。」見丁祖蔭，《丁初我日記》，宣統元年正月 14 日。

⁶⁴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8 月 9 日日記，頁 522。

早在 1893 年，徐氏一族捐田 70 餘畝開設桂村書院，以為本鄉士子應付科舉書院之用。⁶⁵ 後來，徐兆璋因應科舉變革，而對桂村書院的制度作出調整。在此引用《重修常昭合志》的記載以作說明：

桂村兩等小學，邑人徐兆璋等於光緒二十八年將桂村書院改辦，初名蒙養學堂，繼稱初等小學。經費以桂村舊有書院田為基本，不足由校長捐助之。創辦之初，即以書院為校舍。三十年遷於體仁局、三十二年復移於周神廟。後又擴充校舍兼辦高等。⁶⁶

在《徐兆璋日記》中，對於徐與其族人經營學堂的成果亦有記載。⁶⁷ 但從記載中可以看到徐家經營學堂之動機，不如地方志所聲稱的那樣具有強烈的道德感。因此，其有必要與其他士紳共同掌握地方教育資源，以為家族經營策略之必要。為保障家族在地方社會的地位實有必要搶奪教育會的控制權。

徐兆璋在日記中對於與其不同派系的士紳有如此的記載：

城中仍是龐〔鴻文〕、邵世界。芝孫等組織一學務公所，龐、邵聞而大忿。後由蔣子蕃調停，移設游文學堂，仍舉龐、邵為總理。故芝孫思另立一學會以反抗之。昨晨，弟始入城，芝孫來晤，謂東鄉既結團體，宜亦設一公所以主持之。弟謂主持之人偏不易得，須各鎮認可，擬請雙南主持。⁶⁸

他為保證自己的系統能成為「正統」的常熟教育會，便把其所創立的虞東學會併入教育會，以加強其正當性。在寫給丁祖蔭的信中說道：

學部所定教育會章程，每縣只准設一處，其應盡之義務以設研究會、師範傳習所為宗旨。實與常昭學會所辦之事吻合，公學會可不用解散，而自無立足處矣。茲將提學使辦事權限及教育會章程二扣抄寄，祈察收。

⁶⁵ 陳涵樹，〈清末民初常熟東境興學概況〉，《常熟史志》，第 7 期（2013 年 6 月），頁 38。

⁶⁶ 《重修常昭合志》，第 9 卷，〈學校志·學堂〉，頁 38b-39a。

⁶⁷ 「翰叔辦理桂村不過兩月，已得名譽，可見公理之自在人心也。」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5 月 1 日日記，頁 633。

⁶⁸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10 月 26 日日記，頁 548。

虞東學會擬俟虹回里布告教育會章程，即行解散，擇會員之合格者具入會，願書簽名列簿，併入城中以為統一之先聲。⁶⁹

面對其他士紳取而代之的作為，徐兆瑋等人亦有因應之法。丁祖蔭曾想請江蘇教育總會以為背書。⁷⁰ 徐兆瑋認為「公學會自在解散之列，虞東擬亦併入城中，此事弟歸來決計行之。且萬不可設分會，一設分會，勢必另生枝葉，必要合爐而治，同釜而炊，彼族庶不至再滋他議耳。」⁷¹ 由於潘毅遠等人意欲在常熟地區再成立一個教育會，⁷² 與原有之教育會相抗衡。甚至想進一步搶占勸學所與視學使之位。⁷³ 徐兆瑋就有收到「城南黨」攻擊其士紳之文宣。⁷⁴ 對於兩派士紳之間的鬥爭。徐兆瑋曾寫信向友人表示：

惟敝處常昭兩邑，新舊紛爭，士風日壞，其始謀占賓興校士公款，而有

⁶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8 月 15 日日記，頁 688。

⁷⁰ 丁祖蔭曾寫信與徐謂：「師範日形腐敗，圖畫、體操俱以衝突輟課，只有史、地、算學三科由陸總教，日課史論一首，一飯後即嘩然出堂矣。龐已赴滬，本赴湘，聞水災，又將折回。全權歸楊，經費盈餘該黨必不肯認，且目下情形已為南黨盤踞，不可收拾，惟有破壞政策實行後再改別種學校耳。龐至此已明認為南黨首領，使彼黨舉彼及俞、楊、陸為會長，代攜公學會報告書於江蘇學務總會以謀聯絡，該會成立則常昭學界擾亂益不可問。」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5 月 22 日日記，頁 645。

⁷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8 月 16 日日記，頁 689。

⁷² 「與映南書云：……知邑中學界由潘毅遠創論調和兩會，芝孫獨力難支，已允所請，囑弟到常竭力扶持芝孫，以免再有失敗。初三日到常晤芝孫於公祠，則毅遠亦在，手持一名單，係公學會所舉會長，潘、任、狄、沈肇事諸人均列職員。潘之言曰常昭學會已改教育會，公學會亦改教育會，倘批准後是一縣有兩教育會也，不如以兩會組織一會，勢力平均，庶免衝突。弟面折之曰：如須勢力平均，是當舉兩會長、兩副會長矣，恐走遍天下不能覓此學會也。且會長須投票公舉，今以公學會之個人私見，而欲常昭學會全體公認，決做不到。嬉笑怒罵，陳說百端，而毅遠一味鈍皮老臉，此事雖未達目的，然必再起風波。芝孫定於十一日開選舉大會，如有風潮，數日中可以現形矣。……」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10 月 23 日日記，頁 720-721。

⁷³ 「毅遠既為南黨渠帥，又得龐大暗中主使，近且謀奪勸學所與視學官，所幸蘇提學將來或不至黑白無分曉耳。法政學堂正是毅遠總理，以歷史地理敷衍，可笑之至。王葆初亦在其中，頗迷信，毅遠未知采南有法以警寤其叔否？江蘇學會於廿日大會，議改教育會，芝、雙二公必欲瑋到，然實不能分身。」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11 月 3 日日記，頁 724。

⁷⁴ 「飯後至縣自治籌備公所，有南黨遍發印刷品，為教育會事攻訐邵玉銓者，殊可一嘆。」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10 月 25 日日記，頁 1123。

毆辱學務公所職員之事；其繼謀奪師範學堂管理，而有明倫堂開特別公學會之事；近且圖握學界全權，而有將公學會改設教育會之事。明知曾君樸、丁君祖蔭等所辦之教育會成立在先，且為眾所歸，乃借一二巨紳之援，以相阻撓，以蘇學務處之深悉底蘊也，捨之而呈寧學務處、呈學部，冀僥幸於萬一。⁷⁵

在《徐兆瑋日記》中對於常熟地區的學堂有許多的描述。通過他的描述，可以瞭解常熟新式學堂的創辦過程。他曾參觀城東小學堂，「觀其結構，頗幽勝，蓋昭邑廟之旁屋也」。⁷⁶亦有士紳把「任陽小學堂將廟屋改作校舍，屋外本有公地可作操場，為洪、楊兩姓借蓋草屋數間，乞轉函邑尊，諭飭地保催其遷讓，以便及時建築」。⁷⁷通過這些記述，有助於認識新式教育如何在地方上運作。在《重修常昭合志》中，教育會後面的權力鬥爭「消失」不見。但是，從〈教育志〉對各學堂的描述，依然可以看到興辦學堂的人士儼然分成兩派，如速成師範學堂、儒英高等小學為龐鴻文等人所建立。若沒有《徐兆瑋日記》的記載，單以地方志認識地方教育事業，實難得知其中的利害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徐兆瑋對經營學堂缺乏信心。他意識到學堂學習所付出的時間與成本較高。因此認為對自我的生涯規劃而言，遊學日本會是一個較好的選擇。他曾向友人表示：「弟已請赴日本游學，俟學部給咨後便道歸里，歲底赴東，可插入法政班也。和文素未學習，特以在東有族戚數人可為舌人。使屏棄他務，悉心習之，期以半年可通淺近書報。」⁷⁸徐兆瑋選擇就讀法政班的原因，為其可於短期之內完成課程。他曾分析唸法政班的好處，因「文科非五年不能畢業，且恐五年尚不能畢業，不如改習法科，以足下之明敏，三年決可有成。今之入法科者，東語亦多未諳，仍以漢譯書為藍本，試驗用漢文，更可假借。」⁷⁹徐兆瑋的說法，亦可代表部分中國士人的看法。

徐兆瑋離開家鄉遠赴日本遊學，雖為時甚短。不過，對其學問之長進有莫大

⁷⁵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1冊，1906年11月21日日記，頁730。

⁷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2冊，1910年10月14日日記，頁1121。

⁷⁷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2冊，1910年12月20日日記，頁1136。

⁷⁸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1冊，1906年6月2日日記，頁649。

⁷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2冊，1907年12月3日日記，頁801。

幫助。他認為「東邦新出圖籍爛若雲錦，究其能自樹立，不隨時限磨滅者，惟有著名諸博士之著述。法政書迺譯日多，其真有價值者亦寥若如晨星，足下素究心此事，末識近日之觀念若何？」⁸⁰並有意在一年學期「畢業後擬再留東三月，於政治、教育實地調查，冀稍得一知片識，牖啟愚蒙。」⁸¹

除了學問以外，日本對其最有啟發的是日本的地方自治。徐兆瑋認為「日本振興之原因在地方自治，町村成績首崇儉約，次整風俗，其預算精密，家國一轍」。⁸²其時，中國官員對日本的地方自治經驗甚為欣賞，紛紛組團前往日本參觀。其中，3 個推廣地方自治最力的村落最為中國士紳所熟知。⁸³徐兆瑋沒有機會前往 3 村參觀。但是他透過閱讀日本學者江木翼《地方自治模範》（漢譯版）一書，對其所談及之「三村經驗」相當欣賞，並在書信中向族叔推薦此書。⁸⁴同時，他亦對其他日本研究地方自治之書籍甚為注意，並意欲以其為常熟實行地方自治之借鏡。⁸⁵他亦有意以開設模範城村為其畢生志業。⁸⁶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留學日本，亦肯定日本經驗。但是他仍堅持把家中晚輩送進學堂。他如此表示：「東瀛之游蓄意已久，惟須將兒輩送入學堂始可放心。」⁸⁷顯見他在看待家族的地方策略上，仍保持彈性。徐兆瑋在日本所認識的地方自治概念，有助於日後他理解江

⁸⁰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7 年 11 月 7 日日記，頁 794。

⁸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8 年 2 月 2 日日記，頁 834。

⁸²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8 年 2 月 4 日日記，頁 836。

⁸³ 此 3 個村落為千葉縣山武郡源村、靜岡縣賀茂郡稻取村、宮城縣名取郡生出村。關於中國官吏視察的情形，可參看黃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頁 191-196。

⁸⁴ 「與翥叔函云：……《地方自治模範》一書甚佳，三村成績大可仿行，叔購閱之否？」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8 年 1 月 13 日日記，頁 826。翥叔即徐鳳書，其生平可見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常熟人物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年），頁 125。

⁸⁵ 「瑋近思搜羅日本關於市町村之書，以為他日施行之模範。以本地方人治本地方事，但使留心公益，定足造福里閭。況吾鄉生活程度本不甚低，下流社會之智識亦易開通，能如日本之模範三村為全國所取法，亦事在人為耳。」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8 年 1 月 30 日日記，頁 832。

⁸⁶ 「弟宗旨大變，營求善事，斷不願為，惟願多讀數卷舊書，稍益身心，俟十年後在鄉辦一模範町村，以了一生，末知能如願否？」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9 年 2 月 5 日日記，頁 937。

⁸⁷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9 月 16 日日記，頁 540。

蘇各地所推行的地方自治。

肆、新式教育與常熟的地方政治

早於 1903（光緒 29）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大力推動小學堂將既有的書院、私塾改造為學堂，並以地方官與士紳合作的方式推動地方學務。⁸⁸ 1906（光緒 32）年，江蘇巡撫端方在江蘇各地推行新政，開設地方自治研究所、實地調查所，訓練自治人才，籌設議事會、董事會。⁸⁹ 在此情況下，士紳進一步得到管理學堂以至地區教育的權力，並擁有徵收教育稅的權力，引起百姓的抗拒。徐兆瑋認為「鄉愚疑為寫捐，多有自匿其田畝，不肯報納稅之多寡者。與之細談，亦似有不深信之意。程度不齊，無可強求，恐東西立憲國亦不能人人開通知識也。」⁹⁰ 而且，學堂學生在外之舉動亦為人側目。徐兆瑋觀察到「報本賽會師範學生又有被毆之事，竊恐此後學界之風潮稍息，又將受外界之刺戟。地方社會未能開化，學生位置愈高，則其仇視愈甚，且學生只有代表之虛名，而無實在之人格，其受刺戟更甚，勢必以一肢動全體，不可不先事預防也」。⁹¹ 從此記載中，亦可以看到學堂學生在地方社會擁有一定之地位，其言行亦影響到外界對新政之看法。

在新政開展之時，士紳們積極參與地方自治之推動，以保全其地位。徐兆瑋亦參與自治公所之成立。⁹² 從日記中可看到其參與自治公所會議的情況。⁹³ 地方

⁸⁸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頁 200。

⁸⁹ 沈懷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 期（1980 年），頁 304。

⁹⁰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 月 5 日日記，頁 1140。

⁹¹ 「王葆初、陳慰慈來，言昨日葆初到會情形，種種可笑，其目的在設立縣自治籌備公所，每日開支用款至有日須四元之說。職員不由公推，全憑一二人之私見，且經費即在漕糧帶徵項下提撥。而此成立期內專辦鎮鄉之事，是明明以城區監督鎮鄉，可笑孰甚。共議反對之策。雨不止，至聚豐園小飲，議定二事，一常昭縣自治應分辦，二先領自治經費四百千。」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6 年 6 月 15 日日記，頁 656。

⁹²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6 月 14 日日記，頁 1094。

⁹³ 「下午，至自治公所議民政調查事，予倡議昭文仍由三團體承認，惟常熟初則以各鎮各辦

自治的首要任務，為重訂市鎮行政區域。惟其所面對之反彈甚大。他在日記中提到：「下午縣自治籌備公所開會，專劃昭文區域。魁春初先定為十七區，眾多反對，皆係不願合併，然亦無必須獨立之理由，故昭邑區域只算劃定。即有爭執，恐亦難於措詞矣。」⁹⁴就徐兆瑋所見，士紳往往只關心鄉里之利益，卻沒有負擔推行地方自治之責任。如他「頃見縣署發地保查報戶口數表，說有云此表着各圖地保限三日內填送，違干革究。嗚呼！地方紳士徒知爭經費，爭區域。調查戶口也，調查選民也，一事不能辦，使地方官惟地保是賴，不亦大可悲乎？然以憲政重要之事，而寄之不識一丁之地保，尤可痛也。」⁹⁵從這些記述中，說明地方自治執行上所碰到的一些狀況。

清末新政中體現地方自治精神的重要政策，在於舉行議會選舉。徐兆瑋意欲以教育會為其基礎，作為選舉之後援。同時，欲通過組織自治研究會等以調查討論為宗旨，立於言論監督之地位，並認為「凡兩邑明達平正之公民屈指可數，倘能羅致一堂，或可稍生效力」。更可以聯結附近之太倉，欲結成一大團體，以《江蘇公報》為機關，則更足擴張我勢力。⁹⁶由此可知，士紳往往通過學會等制度性媒介，以「啟迪新知」等名義來擴張其在地方的勢力。

不過，由於學堂的經營開銷甚多，需倚仗官款、產業租入等作為其收入來源。⁹⁷若稅收不理想，則影響到學堂之營運。而徵稅過程中往往引起民眾不滿，因而引起毀學事件。⁹⁸在常熟一地，亦見毀學事件。1910 年 5 月，由於鄰近常

請，迨孫仲岡大令不以為然，又議緩一月組織，一時頃始定。又議分撥經費，城議員浦君培言，須以稅額分派，為眾所指摘，始無言。」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4 月 3 日日記，頁 1072。

⁹⁴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9 月 11 日日記，頁 1112。

⁹⁵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9 月 22 日日記，頁 1116。

⁹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8 月 25 日日記，頁 1183。《江蘇公報》由龐獨笑、張東蓀等人於 1911 年 9 月在蘇州創立。

⁹⁷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頁 72-73。

⁹⁸ 阿部洋指出毀學的幾個動機：（一）地方官紳稅收的壓榨；（二）沒收寺廟；（三）進行戶口調查；（四）米價暴漲；（五）反洋教；（六）禁止迎神賽會；（七）其他原因。見阿部洋，《中國近代學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學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1993 年），頁 161-213。

熟的太倉出現因毀學而引起的亂事，⁹⁹ 隨即波及常熟。起因於鄉人對地方自治不滿，致使受鄰縣影響，引起騷動，破壞學堂與鄉董等人之住所。¹⁰⁰ 雖然亂事很快平息，惟如何善後是一個問題。對此，士紳與地方官吏以「有錢者賠償，無錢者懲辦」作為原則。¹⁰¹

雖然，隨著地方官吏的強勢介入，局面有所穩定。但對徐兆瑋而言，看到新式學堂等新政措施對地方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他對友人所說的一段話，可以看到他如何看待毀學的問題：

今歲考試大盛，邑館中聞無容足地，罷科舉之名而陰行其實，何貴乎變法也？照此做法，將來如何結局？即以教育論，歲糜若千萬金，讀學部統計表，令人不怡累日。養成如此之人材，已可怪詫。乃今歲江南、北毀學之報告絡繹不絕，初以為必有原因也。近觀太倉境連毀數校，吾邑亦毀歸市一校，實覺不可思議。既未苛捐，又無招怨，且借口調查戶口，而教習實不預聞，殆百姓心理學之作用似與學堂有不兩立之勢，是以一觸即發耳。今在上者日日以普及教育號於眾，詎知開通如江蘇，其現象且若此耶？至於其他新政之洽人意，更有不忍縷述者。從前喜新之人，今轉以守舊為是。¹⁰²

其後，士紳除面對毀學的衝擊以外，亦得面臨天災之考驗。

1911 年 8 月 26-28 日，常熟一地連降大雨，城區河水過岸，西門附近的九萬圩、環秀弄、西倉前、虹橋下塘、西涇岸、荷香館、方河池一帶水深及腹，可以

⁹⁹ 〈分類新聞：太倉亦有調查毀學風潮〉，《申報》，上海，1910 年 5 月 19 日，版 11：「太倉州東北鄉時恩鎮因民政調查，鄉民疑慮，波及公立小學堂，於初七星期晨，將該校拆毀，器具什物，盡付一炬，幸未傷人。」

¹⁰⁰ 「與丁芝孫函云：此間風潮本已稍定，乃受太境之影響，昨日打毀歸莊李、葛二家，夜中復擾及一道士家，云將年康簿賣錢，愚民之愚，匪夷所思。今晨太境王秀橋學堂打毀，並毀董事吳姓家。市人大哄，互相爭鬥，猶言怕死也。浸假而未調查之圖亦波及矣，浸假而非調查之人亦被累矣，一片擾亂情形，覺公民所言諸原因，尚不足窮其真相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5 月 18 日日記，頁 1086。

¹⁰¹ 「午，謁魁春初大令，議調查滋事辦法，大抵有錢者賠償，無錢者懲辦。」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5 月 22 日日記，頁 1088。

¹⁰² 《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6 月 12 日日記，頁 1093。

行舟。城外幾成澤國。災區方圓 30 公里，殃及 27 鄉鎮，有 20 餘萬人遭災。¹⁰³常、昭兩縣之縣令亦「冒雨步行，至老城隍廟祈晴」。¹⁰⁴由於「兩大令言語不通，各議員新名詞滿嘴」，故災民誤以為其「不准報荒」，進而引起民變。¹⁰⁵其後，數千災民入城鬧荒，遭到鎮壓。¹⁰⁶在日記中，徐謂當地「連日風雨交作，低平區一片汪洋，米價驟漲，民食艱難」。附近之地痞「將城自治公所及邵息老住屋搗毀一空。同時，東唐市、洞港徑、白茆新市當棧、米行均被搶劫」。¹⁰⁷根據其友人記述云：「初四日起至初十止，幾變為搶掠世界。弟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焦急異常。幸十一一起稍覺安靜，然災區大米價昂，非籌數十萬金不足濟事。今冬明春必更擾亂，如何？」¹⁰⁸而「自派兵鎮懾後，大局尚屬安靖。惟災區甚廣，來日大難，是在司民牧者亟籌善後事宜，庶可免死灰復燃之慮。」¹⁰⁹徐兆璋觀察到「吾邑此次之災，固非人力所能料。然飢民構衅，則咎有所歸。去歲並無災象，乃因老婦鬧賑，黔中君姑息，竟罄積儲以為孤注。民氣日囂，遂有今日之變。」¹¹⁰這場騷動對於常熟造成嚴重破壞。按其友人的觀察：

一鄉米業十室九空，商業俱因之減色。尤可痛者，亭林校搗毀殆盡，五年心血付之流水，實心辦事者天怒而人怨之。唐市教育機關從此中斷，非第下學期如此，恐遲至明年亦難望成立，蓋各校皆以租息米捐為絕大之關係。¹¹¹

因此，為防止再度出現因天災而起的騷亂，士紳決定儲藏谷糧，以為不時之

¹⁰³ 「《常熟市志》第二編（自然環境）第七章（自然災害）」：<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422827.htm>（2014/7/22 點閱）。

¹⁰⁴ 佚名，〈常昭水災鬧災日記〉，收入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 年），頁 135。

¹⁰⁵ 佚名，〈常昭水災鬧災日記〉，收入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 135-137。

¹⁰⁶ 常熟市水利志編纂委員會，《常熟水利志》（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 年），頁 6。

¹⁰⁷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9 月 10 日日記，頁 1191。

¹⁰⁸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9 月 16 日日記，頁 1194。

¹⁰⁹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9 月 19 日日記，頁 1198。

¹¹⁰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9 月 26 日日記，頁 1200。

¹¹¹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9 月 27 日日記，頁 1201。

需。¹¹² 與此同時，官紳們合力展開救災工作，如「開辦平糶，定五日一期，共發十期」，¹¹³ 以舒緩水災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惟在其後出現更大規模的地方動亂，推翻清朝的統治，亦考驗地方士紳的應變能力。在政權變易之際，近代化對地方社會所造成的壓力更重，士紳亦要作出因應。

伍、民國初年的常熟地方政治

自新軍在武昌起事以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江蘇曾因政局不安，而一度陷入混亂。¹¹⁴ 在常熟地方而言，邵伯年、丁祖蔭等人倡議建立防務自治會，「以維持治安為宗旨，分飭兵段晝夜檢巡」。¹¹⁵ 由丁祖蔭出任臨時民政長、¹¹⁶ 常熟縣首任知事。¹¹⁷ 徐則在何市組織團防，「以維持秩序、保衛治安為亟」。¹¹⁸ 省內之亂事在 1912 年中平定。¹¹⁹ 亂事初定之時，新的政治秩序亦逐漸在地方形成。

1911 年 11 月 7 日，常熟、昭文兩縣合併為常熟縣，地方人士自行成立民政局，為縣行政機關，推選局長主持縣政。11 月 15 日，根據江蘇省都督程德全之

¹¹² 「翰叔十四日蘇州函云：城中自動議積谷後，廿八、廿九兩日二縣將二十四年份起至去年止開支收入總數榜示署前，邑中紳士議初十假常邑廟集議查帳辦法。」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0 月 12 日日記，頁 1206-1207。

¹¹³ 佚名，〈常昭水災鬧災日記〉，收入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 141。

¹¹⁴ 「曹憶萱言，無錫有土匪鬧事，或言江陰亦因搶米紛起劫掠，無錫恐因此波及也。然兩邑均與常昭逼近，益動歸思矣。」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0 月 26 日日記，頁 1215。

¹¹⁵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清宣統 3 年 9 月 15 日。

¹¹⁶ 「宣統三年八月，民國軍起於武昌，沿江區域率先響應。九月十八日，常熟建旗改革。次日，淞滬民軍至，市民安堵如常。常昭併治，以昭文署為公廨，推丁祖蔭為民政長，後改稱縣知事。地方募防衛隊一百名，設局於自治公所，由鄒魯望主之。」見《重修常昭合志》，卷 10，〈兵防志·兵事〉，頁 23b。

¹¹⁷ 〈各縣知事履歷一覽表〉，收入江蘇省行政公署內務司編，《江蘇省內務行政報告書（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126。

¹¹⁸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1 月 17 日日記，頁 1219。

¹¹⁹ 見丁祖蔭編，〈常熟民政署報告〉，收入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 186-195。

電令，民政局改稱民政署，民政局長改稱民政長；民政署內設總務、學務、實業（勸業）、主計、警務等課。¹²⁰ 惟常熟的地方政治仍然掌握在丁祖蔭手中。¹²¹ 與此同時，政治格局上亦延續清末以來地方自治的推行過程，如按照新政的原有步伐，在何市舉行民政長初選。¹²²

在新局面初成之時，常熟士紳間的鬥爭依然沒有停止。由徐之日記看來，城南黨似已不復存在，惟丁祖蔭依然是鬥爭的焦點。教育款項之分配亦是爭議之一。如有士紳有意把稅捐收歸民政局管理，以杜絕前清士紳包攬稅收之弊病。¹²³ 然而，丁祖蔭掌握教育款項的分配引起諸多士紳之不滿。如徐曾謂：「芝公仍以指定學款為言，是以共和為名而行專制之實，恐不足以服眾。」¹²⁴ 大局初定之時，各士紳亦回復以往的工作，開始在地方興建學堂。¹²⁵ 徐本人亦與族人商議「明年於陳涇橋家祠內設初等小學，由族人捐助開辦經費及常年經費。」¹²⁶ 這種興辦學堂之盛況，亦表現在《徐兆璋日記》中。¹²⁷ 1913 年在常熟一地，學校已有「一百六十八處，學生數達八千人以上，比元年度（1912 年）加增半數。」¹²⁸ 可見

¹²⁰ 「《常熟市志》第十三編（政權政協）第二章（民國期間行政機構）第一節抗戰前縣署」：<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501127.htm>（2014/7/23 點閱）。

¹²¹ 「城中民政長屢次易人，現舉定丁芝孫。廿九日到城，芝孫赴議會，屬為代理。禁如亂絲，竟無從下手。本以五日為期，今午芝孫歸來，可以卸肩。明日一舸下鄉，或冀免魚爛之禍。然大局岌危，人心如故，傾軋毀謗，層出無已，一芝孫獨如常熟何？」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1 月 26 日日記，頁 1223。

¹²² 「今日為何市鄉選舉民政長初選當選人之期，予往襄事，四時開票，當選者為翰叔及聘之二人。」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5 月 17 日日記，頁 1282。

¹²³ 「許師叔來函云：……典捐一已用正式公文照會民政局。此項典捐係完全地方稅性質，昔日城紳專制，強歸城用，今當革新之際，若不再行爭回，是一誤而又再誤也。」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2 月 21 日日記，頁 1227。

¹²⁴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12 月 25 日日記，頁 1228。

¹²⁵ 「與許師叔函云：前日張市王采南、鄭子穎來，擬明年速合虞東諸鄉辦一高等小學，未知尊意如何，希即示知。鄙意如足下贊成，可於近日約至城中集議，桂校明年高等決計停辦矣。」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12 月 6 日日記，頁 1316。

¹²⁶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2 月 7 日日記，頁 1264。

¹²⁷ 「今年小學生甚多，課堂有不能容之勢，又將添造矣。」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3 月 14 日日記，頁 1270。

¹²⁸ 〈報告：各縣風俗制度調查報告表（依部頒通俗教育調查第一表式）——常熟縣〉，《江蘇

教育機關增加速度之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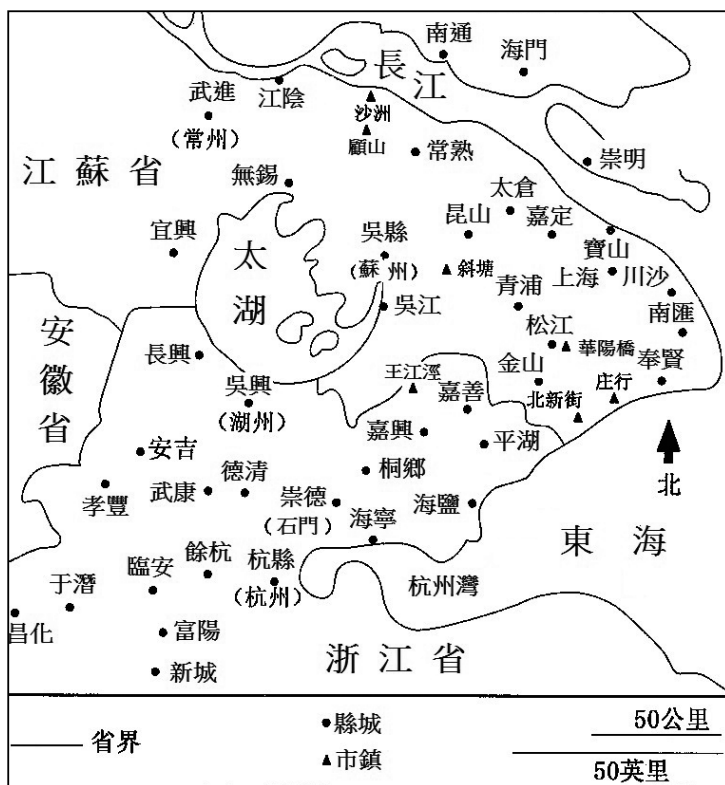


圖 1、民國時期的江南

資料來源：白凱著，林楓譯，《長江下游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鬥爭（1840-1950）》（上海：上海書店，2005 年），頁 230。

與此同時，常熟地方亦進行各級代表的選舉。在日記中記載當時投票的狀況：

晨至招待所，吾鄉之投票人午前來者甚眾，惟歸莊、項橋午後始至。三時後投票人麋集。余入場見簽字桌二處俱被擁擠毀損，秩序紊亂，乃令投票人暫時退出，重行布置會場。四時東周市人與王夢良衝突，幾至毆

教育行政月報》，第 14 號（1914 年 6 月），頁 32-36。

打，秩序復亂。發票至六時始止，尚有因擠而出場未投票者，聞幾及百人。統計實到數二千八百餘人，可云盛矣。夜，諸鄉監察員議善後之策，擬分六鄉為二區，分設一投票區於吳市，監察員另繕意見書。予被推為公民代表，亦具一意見書。¹²⁹

同年，社會黨、自由黨、同盟會（同年 9 月改為國民黨常熟分部）等相繼在常熟設立分部，¹³⁰ 地方政治呈現全新之景象，部分黨派已頗有規模。¹³¹ 徐兆璋作為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亦成為各黨派所要拉攏之對象。如其好友張叔穎曾邀請其參加同盟會。¹³² 徐兆璋認同同盟會之理念，惟認為同盟會未成氣候。¹³³ 而且徐兆璋認為「同盟會委托錢老三組織支部，恐黨員魚龍混淆，將來地方或受其害，乃力諍蘇州支部取銷前令，重行組織，庶將來得收良好之結果云。」¹³⁴ 徐兆璋所提及的錢老三為當時常熟地區的軍警頭目，被稱為「殺人魔王」。他曾領兵鎮壓 1911 年的「千人會」動亂，在地方名聲不好。¹³⁵ 其後，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由錢景高（1876-1929）擔任常熟分部部長。¹³⁶ 因此之故，徐兆璋已與國民黨有所往

¹²⁹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12 月 6 日日記，頁 1316。

¹³⁰ 「《常熟市志》大事記」：<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489527.htm>（2014/7/23 點閱）。

¹³¹ 如共和黨在於公祠設立黨部，亦在各鄉有分部。從此則告白可看到共和黨在常熟的拓展。〈告白：共和黨黨員公鑒〉，《常熟七日報》，第 65 號（1913 年 6 月 19 號），頁 1：「本分部於春季大會議決：黨員納費常年減收一元。各黨員有未繳常年捐者，請逕交各市鄉分事務所，隨給收據。海虞市黨員即交于公祠本分部事務所為禱 共和黨常熟分部啟」有報刊記載「吾邑共和黨人數達二千以上」見〈社論：聞共和黨部長演說有感〉，《虞陽報》，第 139 號（1913 年 3 月 20 日），頁 1-2。此數字雖有誇大之嫌，但亦能得見常熟對其普遍之觀感。

¹³² 「張叔穎函云：龍尾組織同盟會，於初六日先開談話會。」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6 月 17 日日記，頁 1287。

¹³³ 「其意甚盛，但鄙意黨員須純粹以精，不可再蹈統一黨之覆轍，究竟贊成者有若干人，已滿周甲之數否？」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6 月 20 日日記，頁 1287。

¹³⁴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6 月 28 日日記，頁 1288。

¹³⁵ 祁龍威，〈附錄：千人會起義記〉，收入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 206。

¹³⁶ 常熟市文化局，《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頁 90。關於錢景高之生平，可見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常熟人物選》，頁 97-98。

來。¹³⁷ 在張叔穎等人的主持下，出版國民黨的地方機關刊物《新常熟》。¹³⁸ 徐兆瑋亦被選為參議院議員，從此進入北京政壇。¹³⁹ 之後，他雖不常在常熟，然而經由族人與友好之通信往來，得以掌握常熟之狀況。

在從事中央政治工作之同時，徐兆瑋為了宣傳地方政治的相關主張，也有意參與報刊的運作。他曾在友人張美叔所主持之《虞陽日報》中投稿。¹⁴⁰ 另曾對友人孫希孟謂：「吾邑報界為一二揮弄筆黑者自貶聲價，非痛罵即冷嘲，何嘗有一篇正論，使閱者心服？鄙意此後當力矯其弊，議論一出於正，對於官吏及議會之違法尤宜以法律智識繩之，卓見以為然否？」¹⁴¹ 因此，他有意與虞東教育會之成員「組織一種旬報，大約先籌半年經費，兩報（另一報為《新常熟》）」¹⁴² 互相提攜，或足監督官署，伸長民權。」¹⁴³ 同時亦希望通過報刊的言論，引領地方社會之討論，進而影響縣議會法案之審議。¹⁴⁴ 徐兆瑋為了與《新常熟》之性質區別，

¹³⁷ 「晨王夢梁來訪，與偕至繆公祠國民黨事務所，晤錢南山。」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10 月 31 日日記，頁 1310。

¹³⁸ 「張叔穎函云：此間出報，業已開職員會，決定報名《新常熟》，於廿五號發行五日報也，此後鄉人有喉舌矣。」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7 月 20 日日記，頁 1292。

¹³⁹ 「蘇州電眾議院議員第二區複選今日（十六）開票當選人九名姓氏如左：徐兆瑋四十二票常熟、王紹鏊四十一票吳江、孫潤宇三十八票吳縣、蔣鳳梧三十七票常熟、陳陶怡三十七票金山、徐蘭墅三十七票崇明、姚文枬三十六票上海、雷奮三十五票華亭、瞿啟甲三十二票常熟」。
〈專電〉，《申報》，上海，1913 年 1 月 17 日，版 2。

¹⁴⁰ 「舟中作文一篇，擬登《虞陽報》，存其稿。」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5 月 16 日日記，頁 1282。《虞陽報》，即《虞陽新聞》。時人對《虞陽新聞》的描述為「吾邑之有週刊也。實自《虞陽新聞》始。終始其事者為張美叔先生，時值清末，造在位者對於報界非常箝制。而一般人民頭痛，尤多頑固，不目報紙為造謠惑眾之機關，即加報紙以搗亂是非之名目。《虞陽》甫出版，尤多仇視之。幸主持者不畏強暴，毅力進行。呱呱小兒，不致夭折。旋因報律頒布，須繳保證金，乃有改名《虞陽白話報》之舉。民國初元又定名為《虞陽報》宗旨既正議論亦平。」見〈筆記：常熟報紙小史（一）〉，《常熟日日報》，第 17 號（1916 年 10 月 17 日），頁 3-4。

¹⁴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7 月 20 日日記，頁 1292。

¹⁴² 「《新常熟》：同盟會之機關報（後為國民黨之機關報）為《新常熟》，出版稍後於《七日》而實與《七日》相對峙者也。編輯人為錢君南山，對於時事尤多激昂慷慨之論。常邑輿論界萎靡甚矣。得是報出而鼓盪之，足以一新人之耳目。」〈筆記：常熟報紙小史（二）〉，《常熟日日報》，第 18 號（1916 年 10 月 18 日），頁 4。

¹⁴³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7 月 22 日日記，頁 1292。

¹⁴⁴ 「王夢良函云：刻擬議案三件，對於本邑此項最關緊要，權利之所在，此揭破之手段亦在

認為「不如改刊叢報，每月一冊或二冊，但籌定經費即可實行」，¹⁴⁵ 並「仿教育會雜誌例，即用此格式亦好。趕於縣議會開會前發行第一期，一切政見皆可借之發表。高見如以為然，即可擬定體例，分撰社說，即於虞東教育會中議決此事也。此報即作為教育會之機關報，會員即作為社員。」¹⁴⁶ 自此，作為虞東教育會機關刊物的《常熟旬報》得以正式出版。1912 年二次革命後，革命黨失敗亦牽連到常熟一地的政治局面。由於常熟國民黨分部的成員（如錢漢民等人）在常熟鄉間宣布獨立，為人檢舉。¹⁴⁷ 因此，作為國民黨機關報的《新常熟》亦受到牽連，且虧損嚴重，遂宣告停刊。¹⁴⁸

1912 年 12 月，常熟縣民政長改稱縣知事。1913 年 1 月，常熟縣民政署改稱縣知事公署。3 月，改課為科，設一科（總務）、二科（財政）、三科（教育）、四科（實業），撤銷警務課。同年 4 月，成立縣員警事務所。是年起，縣知事一律由省委任。¹⁴⁹ 其時，徐因國會停開，已回到常熟，亦保持對地方事務的關心。他曾致信與趙青侶討論如何籌募公債之問題。¹⁵⁰

此。惟弟見聞野狹隘，筆下又極枯澀，能於報章鼓吹之則更上一層矣。吾鄉報紙能提前半月發行，尤合時宜。復函云：議案容研究再復。」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8 月 1 日日記，頁 1294。

¹⁴⁵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8 月 2 日日記，頁 1294。

¹⁴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8 月 5 日日記，頁 1294-1295。

¹⁴⁷ 「張叔穎初六日函，略言：南鐵諸君因請宣布獨立事，為人控訴，現奉令查辦。此人幸早他去，並牽連《新常熟》、《自由報》，亦令停版。」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3 年 9 月 12 日日記，頁 1392。

¹⁴⁸ 「錢南山之子宗堡自清華學校寄來南山函，通函處松江城內第三中學。云：家鄉因新莊鄉公所曾請宣布獨立，為怨家所告，奉令查拿嚴辦，並波及《新常熟報》，亦有封禁之令，本議下場得此正好作一結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3 年 9 月 22 日日記，頁 1396。

¹⁴⁹ 「第十三編（政權政協）第二章（民國期間行政機構）第一節抗戰前縣署」：<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501127.htm>（2014/7/23 點閱）。

¹⁵⁰ 「與趙青侶知事函云：前日來城，適台從下鄉勘荒，末克趨謁起居。昨在古里村，與瞿君良士論公債一事。良士於民國元年曾為募集省公債委員，當時勸導認數甚為踴躍，其各市鄉所認數目有成案可稽，此次可仿照辦理。良士極願贊助，但不欲居裏理之名，且非一人所能勝任。鄙意可即與良士斟酌，邀請三四人協商辦法，再定期召集市鄉助理員，分道勸募，末識卓見以為何如？聞典當攤派債票，吾邑共有七千餘金，將由典業經董滙繳，此項如可設法撥歸縣公署滙激，亦一巨款也。又聞縣公款經理處提出公款千五百金交貨物稅

1914 年，袁世凱明令停辦地方自治，¹⁵¹ 並取消國稅與地方稅名義；因此，各地方鄉鎮縣原本的教育經費，需要重新規劃。同時，因「懼有挪用之患，乃組織縣教育款產處，以鞏固教育基礎」。教育款產處「設總董一，或增副董一；由學務委員學董於學董中推舉三人，請縣知事擇一委任；報省查核。監查員一人，則以縣視學充之。凡縣屬教育款產，悉歸經理」；¹⁵² 在常熟縣而言，組織教育款產處之主要成員「為縣視學學務委員、市鄉學董；而學董係助理員，兼任我邑市鄉助理員，不等省令，學董每市鄉，祇准一人」，並明文規定縣市鄉忙漕稅由縣公署按月結算，「由總董具領，分別存儲入冊」。放款時，由學董造冊以支領各縣市之教育費。¹⁵³ 按照官方說法，自從丁祖蔭就任以來，「教育經費之經理清晰、編制預算參加意見之正確、督促市鄉學董徵收學款之切實、學校經常費臨時費之如期支放，不敢謂丁總董外無第二人。」¹⁵⁴ 教育款產處掌握一縣教育經費之分配，故其亦成為地方士紳希望掌控的位置。在常熟一地，許多士紳對於處長一職表示興趣，並通過種種手段進行操作。徐兆瑋雖無意接任此職，有意辭退。惟與其友好人士力勸其切勿辭去。¹⁵⁵ 關於相關情況，在《徐兆瑋日記》中亦有記載：

與孫師鄭函云：……近時因組織教育款產經理處，忽以弟名加入。此事怕王采南與前科長蘇人章伯寅所為，因邵治衡志在必得，多方運動，遲未發表。及趙來而邵頓失勢，於是遂屏邵而易以丁芝孫，以弟與黃謙齋為副。事前既未聞知，事後始知三人中竟有以大力運動者。弟之性情既

所長購買債票，一邑之公款非一二經理其事者所能擅專。且既購公債，不知何以不歸縣公署，而歸之貨物稅公所也？但道路傳聞，容有失實，執事可即托良士詳查，或能得其真相也。陰雨積濕，稻多霉爛，惟盼天早放晴，庶秋成不至減收耳。」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4 年 10 月 27 日日記，頁 1507。

¹⁵¹ 參看胡春惠、李道緝，〈袁世凱總統時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收入國史館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9 年），頁 1-15。

¹⁵² 蔣維喬編，《江蘇教育行政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年），頁 9。

¹⁵³ 〈常熟縣教育款產經理處辦事細則〉，收入常熟縣公署編，《常熟縣三年間教育狀況》（常熟：編者，1916 年），頁 2-3。

¹⁵⁴ 〈敘言〉，收入常熟縣公署編，《常熟縣三年間教育狀況》，頁 2-3。

¹⁵⁵ 「王采南偕其叔葆初來，葆初似欲為說客，令予勿堅辭教育款產理處副董者。予謂芝孫苟不辭，斷無問題發生。……我猶人也，何以日日為人傀儡而任其牽掣邪？吾於是有人不受牽掣之想。教育款產經理處副董，受人牽掣之一也。吾但求所以自立耳，於他人何為焉？」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4 年 10 月 31 日日記，頁 1508。

與簿書、錢穀不相近，近頗思杜門，稍稍有所著述。一經就職，勢必不能安居，於教育款產無所益，而在己則受損多矣。以是計較，決意辭却。且有良士可作替人，推舉第四人即是良士。更無為難之處，想趙公必能諒我也。¹⁵⁶

因此，在徐兆璋之推舉下，由瞿啟甲（1873-1940）接任常熟教育款產經理處長。¹⁵⁷雖然徐兆璋並未就任處長一職。但是他仍在教育款產經理處占有一席之地，¹⁵⁸亦能影響縣內教育款項之分配，可以討論縣內的教育建設。¹⁵⁹

深知內幕的徐兆璋曾在寫給張美叔的信中慨歎：「競爭為近日最壞習氣，而吾邑尤受病最深。爭財政、爭選舉，惟名與利是圖，真可嘆也。若教育競爭為向所未有，實好消息也。」¹⁶⁰可見在地方士紳眼中，經營教育除了可以啟發民智以外，在地方政治運作上也有其作用。由於新式教育的建立過程中，得以統攝地方資源，更能作為一種地方政治的工具。民國以後，現代國家體制逐漸深入地方，教育制度的重要性更為明顯。由於教育機構掌握地方上的眾多田產，其重要性為士紳所重視。有人曾謂：「教育事業首重經費，經費來源攸賴公產，是公產之消長實關係於教育之盛衰。」¹⁶¹不過，其角色與教育會之定位不免有所重覆，因而造成許多紛爭。¹⁶²因此，教育相關職位成為眾人心目中的「涼缺」。自此以後，

¹⁵⁶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4 年 11 月 12 日日記，頁 1511-1512。

¹⁵⁷ 其生平可見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常熟人物選》，頁 94。

¹⁵⁸ 「瞿良士送一函來，言十二日教育款產處開會，務請駕臨，緣圖書館建築籌款附議也。」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3 冊，1916 年 1 月 14 日日記，頁 1613。

¹⁵⁹ 「復瞿良士函云：……承示建築圖書館用石擬在白茆廢閘運載，並屬弟在教育款產處提議，弟以為此事無庸提議也，論此石之所有權，乃為省有，而非縣有，且與教育漠不相關，則非學務人員所能議決也審矣。」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3 冊，1916 年 6 月 15 日日記，頁 1654。

¹⁶⁰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7 月 15 日日記，頁 1165。

¹⁶¹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3 冊，1918 年 1 月 7 日日記，頁 1857。

¹⁶² 「張映南又另函予與良士云：家鄉別無風潮，昨日忽發生西倉基地一事。此案本由教育款產處承領，以五百元定西倉，五百元定圖書館，不意芝孫不知何意，忽將基地之款歸入圖書館，而西倉基地請移轉於私人，其承領之名為初園、藝圃近相傳為揉園尾巴矣及某某樹藝社。經款產處聲明，非以真姓名具領不可，則又改為丁德柔、張行素。實即雙南也。已繳款數千元，忽又為枕石黨所聞，於是印士、又申群起爭領，而教育會又起而詰問。主如老二又誤認教育會與教育款產處為一機關，大罵芝孫，斥言如此徇私無責任之總董，如

教育款產經理處成為許多士紳意欲搶奪之位置。

在地方社會進入近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地方士紳致力於在新的制度下為自身的利益取得最大的保障。在這過程中，不得不以新的角度去看待以往存在於地方社會的種種行為規範。因著新的制度，讓他們對於這些規範的態度出現轉變。就徐兆璋等人而言，其對於地方信仰的態度值得加以探討。

陸、常熟的地方信仰與逐漸「近代化」的士紳

在地方政治事務上，士紳雖然進入近代化的政治體制，但其思維仍然受限於既有之區域因素與限制。對他們而言，地方信仰是一種限制，亦是一種令其難以割捨的規範。

在《徐兆璋日記》中記載許多對地方信仰與風俗的觀察。自明清以來，對周孝子的信仰一直在常熟地區流傳，更影響鄰近地區。¹⁶³ 而其興盛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同步的。¹⁶⁴ 從日記中看來，周神信仰仍盛。他記述「是日為周孝子報賽之期，傾城士女舉若痴狂。午後，偕羈青叔至周神廟瞻謁，會已出矣。至市前街，擁擠益甚」；¹⁶⁵ 對於賽會中的盛況也有所描述，如「項橋賽會至何市，觀者甚夥，婦女成群，充溢街巷。聞城中今歲賽會極盛，每開面社一人，衣飾值五

不撤銷，決不肯售於教育會。一面又將揉圓尾巴等撤銷，聲言非投標不可。而教育會又力持不能投標，仍須照原議歸入教育項下承領，已二次致書孟樸矣。昨清河使君又欲作調人，以習藝所出名仍歸教育項下，私自轉移，即無私心，亦不免瓜李之嫌，而反對二人亦無非感情權利，均無足取。正當辦法自宜仍歸教育項下公用，二公請即與孟樸剴切言之，若偏聽老二私言，於地方感情固多傷害，且孟樸亦與弟等同為吾邑創辦教育之人，豈可不為輔助乎？再，老二近日將南門外廊棚盡行出售，於是有清理天產及賣天委員之說，廊棚既賣，有欲砌牆者，交通勢將斷絕。南門外有大幫群起責問，且亦領有交通地址已經繳款者，現在亦欲照例斷交通，於是揉圓尾巴有對以壓此字未確，想可意會扁腦袋者，殊可笑也。」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3 冊，1916 年 10 月 28 日日記，頁 1708。

¹⁶³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頁 44-49。

¹⁶⁴ 參看王健，《利害相關：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74-187。

¹⁶⁵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 1 冊，1899 年 10 月 9 日日記，頁 118。

十金，皆以五色水鑽石結成，可謂豪侈矣」；¹⁶⁶「何市城隍賽會消耗約近萬金，太、常兩縣方百里之游人畢集。廿五、廿六二日歸、何兩地路人如蟻，尚不至滋生事端，亦一幸事」；¹⁶⁷除周孝子以外，亦參與其他民間信仰的迎神活動。如他曾參加周神廟賽會「紅男綠女，如雲如荼，亦鄉人之一樂也。聞過一木橋，板傾側，馬墮河中，幸未傷人。戲無益，洵然。」¹⁶⁸

又例如他亦曾參加千聖小王之賽會，對其盛況有以下的描寫：

是日為千聖小王賽會，觀者如堵。予偕陸主如出南門，遲會不至。訪周咏韶，留午飯，偕至映雪小憩。至天祿閣，會始到。常熟向推三廟會最盛，謂東西兩城隍廟及報本道院也，小王廟在次等，然已鉤心鬥角，光華炫目矣。夜會亦盛。¹⁶⁹

一般民眾對地方信仰的盛行有以下的回憶：

解放前有迎神賽會，陰曆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人多得不得了，親戚、小商等趕集場，從早到晚。身份好點的人組織的，在廟裏舉行。年青人穿各種衣服，打扮成古時候的將軍、小兵，舉着看。有的人生病了之後在三月二十八日要到廟裏還願，在隊伍裏遞香，手臂上四五個鐵鉤鉤在皮裏，下面掛鑼，一邊走一邊敲。另外還有龍舟競爭，農曆七月份舉行。¹⁷⁰

有研究指出，明清時期，這些以民間信仰為核心的迎神賽會，顯現出日趨明顯的奢侈風尚。¹⁷¹和丁祖蔭一樣，徐兆瑋認為：比起辦學堂或新政的經費，賽會

¹⁶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5 月 23 日日記，頁 162。

¹⁶⁷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3 年 10 月 31 日日記，頁 1414。

¹⁶⁸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3 冊，1918 年 11 月 12 日日記，頁 1925。

¹⁶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6 月 2 日日記，頁 165。關於千聖小王信仰的研究，可參看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論歷史人物崇拜與寶卷講唱的關係——以中國江蘇省常熟縣的《千聖小王寶卷》為例〉，《興大人文學報》，第 50 期（2013 年 3 月），頁 265-294。

¹⁷⁰ 〈訪問紀錄〉，收入李學昌主編，《20 世紀常熟農村社會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88。

¹⁷¹ 樊樹志，〈江南市鎮的民間信仰與奢侈風尚〉，《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5 期

的支出顯得浪費。徐兆瑋亦批評「歸市周神廟賽會，鎮人釀資演劇。男女塞道，舉若狂痴，糜費敗俗，是亦不可以已乎？」¹⁷² 徐兆瑋認為：「行神賽會，勞民傷財。常熟今歲春賽者三，秋賽者三，是亦不可以已乎？」¹⁷³ 丁祖蔭曾「草〈請縣禁止賽會書〉」，¹⁷⁴ 雖未得見其內容；但從其態度中可見士紳對賽會之盛行，實不以為然。

但是，常熟地方士人一方面厭惡迎神賽會的浪費；另一方面亦對賽會活動甚為喜愛。在同為常熟人的曾虛白的回憶中，可以瞭解到當時的盛況：

三月二十日二十九日，皆有龍舟，而以四月初二日南郭外者為最，自太平港以迄大壩頭，河道廣闊，對山瀕湖，泛舟其間，至饒逸趣，游者多以舟，往昔盛時，常達四五百艘，置酒載花，酣嬉竟日，入夜復有燄火花爆以助興。¹⁷⁵

而在《徐兆瑋日記》中，亦有對龍舟活動的記載：

適四丫里賽會，龍舟雀舫，容與中流，游船蟻集，頗有清明上河圖景象。……睢州王公繻，康熙己卯擢江南糧儲道，杜絕陋規，時人推循吏。嘗脩仲雍墓，封閉城隍廟門。糧道衙門國初即移置吾邑，粵匪之亂署毀於火，乃移建蘇垣，歷任宦迹邑志不載。因感春賽之盛，記王公封廟一事。¹⁷⁶

城中於大東門外賽龍舟，游人甚盛。初一開粥廠，未免相形有莞枯之判。¹⁷⁷

今日西門外賽龍舟，聞往觀者甚眾，邑人游冶之興毫不衰竭。聞今年賽會極盛，新城隍廟蘇軍決定遷出，迷信者偽傳為城隍顯靈，實則並無此書也。¹⁷⁸

(2004 年 9 月)，頁 111。

¹⁷²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9 年 11 月 30 日日記，頁 1040。

¹⁷³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3 冊，1915 年 10 月 17 日日記，頁 1588。

¹⁷⁴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清宣統元年四月初四日日記。

¹⁷⁵ 曾虛白，《常熟景觀》（臺北：臺北江蘇省常熟同鄉會，1981 年），頁 92-93

¹⁷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6 月 4 日日記，頁 165。

¹⁷⁷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2 年 5 月 6 日日記，頁 374。

¹⁷⁸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3 冊，1919 年 5 月 1 日日記，頁 1981。

直至十多年以後，龍舟活動的熱況仍然不減。¹⁷⁹ 在常熟的報刊中，亦有記載龍舟競賽的消息。¹⁸⁰ 值得注意的是，報刊在提到龍舟競賽時，大都附上「耗費不貲」的評語，且容易引起事端。¹⁸¹

有學者指出，自新政以來，原本組織賽會的資產遭到徵收轉移至教育或其他方面。再者，愈來愈多的地方菁英組織轉為抵制賽會。¹⁸² 如徐兆瑋等士紳，對於賽會的態度趨向抵制。對他們來說，寺廟所舉行的賽會花費甚鉅，且無助於地方新政之推行。他認為「家鄉廟會惟南門外周神最盛。兩城隍、報本、大周神均未賽，於此見神會之衰」。¹⁸³ 而且，在許多事例中可以看到新式政治機制與地方宗教在地方資源上的爭奪。¹⁸⁴ 所以，若查看 1910 年代以後常熟的地方報刊，可以看到不少有關議會制訂管理廟產的新聞。就徐兆瑋的家鄉何市鄉而言，議會就因「寓禁於徵，一舉兩得」之故，有意將寺廟收入充作補助地方貧困人士之經費。¹⁸⁵ 這種作法在清末新政時已存在，並延續至民國初年。

¹⁷⁹ 「天氣驟暖，今日西門外賽龍舟，想游人必起興也。」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3 冊，1915 年 5 月 3 日日記，頁 1552。

¹⁸⁰ 「吾邑划賽龍舟，本年春間因各處事變，由楊知事禁止。現在戒嚴時期已過，前日（十九日）邑之南門外，倉浜底划賽龍舟，有十三隻之多，旗傘鮮艷，鼓喧闐口相爭勝，快捷如飛環，觀者不下數百人，頗極一時之盛，然已耗費不貲矣。」〈記事：大家爭看賽龍舟〉，《常熟日報》，第 29 號（1916 年 8 月 21 日），頁 3。

¹⁸¹ 時至今天，常熟仍保持著龍舟賽會的習俗。可參考「常熟湖甸龍舟」，收錄於「虞山閑情——ysl8j 的博客」：http://ysl8j.blog.hexun.com.tw/86374046_d.html（2014/5/10 點閱）。

¹⁸²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著，張安琪、胡學丞譯，〈晚清及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的迎神賽會〉，收入康豹、高萬桑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頁 92-93。

¹⁸³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08 年 5 月 31 日日記，頁 867。

¹⁸⁴ 「守之欲寅谷罰修城隍廟鏡亭寶藏，捐施棺五十具。又臣以寅谷近年光景不佳，此事須四百番，懇稍減讓。守之意稍動，迨歸而守之太太來，則言五十具缺一不可，明早上城聲言進稟，既執不聽勸，眾各散歸。」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3 月 6 日日記，頁 272。「龐伯深來，……詢米捐事，則云各得四成，米商撥一成修神廟，官撥一成作團防經費云。」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1 年 11 月 4 日日記，頁 335。

¹⁸⁵ 「何市鄉議會夏季議決王家觀音廟香捐案，謂：迷信神權原宜破除，但道德教育未發達。一般愚民，崇拜鬼神，足輔道德法律所不及。查太倉縣穿山玉皇廟，終歲香信甚盛，每年有數百千之收入。該鄉公所指撥，以充善舉之。寓禁於徵，一舉兩得。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稟案出示，收取香捐充作公益之用。第一年收數稍多，近則日見玩疲。良由稽查不甚得力，收捐方法未善。是亟宜整頓。本議事會第二年度夏季常會議決，每燒香人捐香金

在新政推行階段，寺廟仍是地方政治的中心，也可以強化地方民眾對其作為公共空間的權威性。¹⁸⁶ 這狀況至民國初年仍然存在，如教育會、勸學所、議會等，都以寺廟作為會所。究其原因，早在明末，城隍廟等已經是地方鄉紳、生員與地方官員談論公眾事務的重要場所。¹⁸⁷ 沿襲此種地理上之布置，主要為加強新式教育機關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此外，在城區地理的角度而言，亦有其優點。在常熟一地的環境而言，寺廟（如慧日寺等）周邊的巷弄是商肆集中之地，¹⁸⁸ 位置實具有便利性，成為士紳之首選。因此，即使已走向新的地方政治模式，在地緣上仍擺脫不了以往的地方傳統。

故此，在徐兆瑋和丁祖蔭日記中，常常記載其前往會議的記述。從記述中可以看到寺廟與家祠經常成為地方士紳商議地方事務之場所，如「農務分會開第一次大會於周神廟」、¹⁸⁹ 「會議競化女校事於于公祠」、¹⁹⁰ 「改選事務所，開調查員會於常邑廟。上午集城區、下午集鄉區，宣布調查方法，分認調查區段」。¹⁹¹ 更有甚者，成為地痞賭博之場所，如慧日寺就是賭徒麇集之地。¹⁹² 同時，地方廟宇亦成為社會救濟服務的中心。如周神廟是「議茶捐及團防經費」¹⁹³ 之場所，城隍廟亦成為賑災放糧的絕佳地點。¹⁹⁴

十文，充作本鄉發給孤貧之用。應請出示並由公所加發通告（下略）。」〈記事：市鄉議記事〉，《常熟旬報》，第 8 號（1912 年 12 月 1 日），頁 2。

¹⁸⁶ 「午後，覺體稍健，偕植兒至市前街老城隍廟花園閒眺。游人如蟻，中多賣畫張者，兒童猥集。」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5 年 2 月 14 日日記，頁 467；「晨至城，晤何憶琴，偕至琴一樓小憩，同赴老城隍廟會場，人多於鯽，汗臭熏人。孫仲岡一人如小丑與眾周旋，可笑極矣。」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8 月 3 日日記，頁 1105。

¹⁸⁷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53。

¹⁸⁸ 徐本堅，〈明清時期常熟城區的地理格局〉，《常熟史志》，第 7 期（2013 年 6 月），頁 49-53。

¹⁸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0 年 10 月 12 日日記，頁 1121。

¹⁹⁰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清光緒 33 年正月初 8 日日記。

¹⁹¹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清宣統 3 年 6 月 22 日日記。

¹⁹² 〈記事：慧日寺中大捉賭〉，《虞陽報》，第 146 號（1913 年 4 月 20 日），頁 1。

¹⁹³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1 冊，1900 年 7 月 12 日日記，頁 184。

¹⁹⁴ 「今日在城隍廟放振，余九時往，已放七成矣。」見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3 冊，1916 年 3 月 31 日日記，頁 1636。

另一方面，寺廟也是地方士紳興辦學堂或具有地方自治機關等功能的場所。惟這往往成為地方社會衝突的導火線。1912 年，常熟縣教育會曾討論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之新地點，「或主張北港廟，或主張智林書院，議久不決，乃公推二人調查兩處地點呈民政署，以備採擇。」¹⁹⁵ 經過實地訪查以後，認為「智林書屋面積較大於北港廟，惜地低屋陋，非完全建築不可。三官堂無擴充餘地，恐不適用」。¹⁹⁶ 然而，由於「徐市人以智林書院為合宜，張市人以北港廟為利便。予晨曾往視智林地址，若不將智林寺之桂影山房併下北港廟，則基地嫌窄，且近池塘，填築功更巨也，議不決而散」。¹⁹⁷ 同年，縣議會更因應否借常邑廟與社會黨作支部一事，引起地方上之反彈。¹⁹⁸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不同地域人群之間的分歧，以及寺廟空間對於地方民眾所具有的多重意義。一旦近代國家體制進入地方，這些意義就會受到考驗。

就徐兆瑋而言，在新政推行時期作為勸學所之總董，因籌款之必要，必須「考察迎神賽會之存款」。¹⁹⁹ 從而瞭解「迷信神權與地方自治之關係極重」。²⁰⁰ 惟他亦認為「賽會、演劇，均無益之事，何不將城隍廟山門戲臺略為修理，值此年谷豐登，募捐似尚易。余夙抱保存古迹主義，神廟亦古迹之一，當有歷史觀念，迷信不迷信又是一問題。」²⁰¹ 雖然，他對地方上的宗教儀式抱持敬意，²⁰² 但也認為賽會與演劇對於地方建設並無益處。

¹⁹⁵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10 月 20 日日記，頁 1308。

¹⁹⁶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2 年 10 月 23 日日記，頁 1309。

¹⁹⁷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3 年 3 月 2 日日記，頁 1330。

¹⁹⁸ 〈社論：論縣議會以公地借社會黨而不借平民小學之非〉，《虞陽報》，第 166 號（1913 年 9 月 7 日），頁 1。

¹⁹⁹ 〈專件：學部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四川官報》，第 20 冊（1906 年），頁 67。

²⁰⁰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1 年 3 月 9 日日記，頁 1153。

²⁰¹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 2 冊，1913 年 10 月 17 日日記，頁 1408。

²⁰² 1916 年《常熟日日報》的一篇論說文章亦抱持與徐同樣的看法。此文認為：「一年容易小周神又賽會矣。夫周神之所以為周神者，以其為孝子也。塑像而崇拜之本，為善良風俗之一種。賽會以遊行街市，使人觸目而驚心。初意原末可謂非，然而今之洞澈意味者，毛麟角。動者與被動者，興之所至，目迷五色而已。嗚呼！以有用之金錢擲於無用之地，數人發之，男女老幼歡迎之。於是，矜奇鬥艷，人山人海。」見〈時評：小周神賽會感言〉，《常熟日日報》，第 14 號（1916 年 10 月 14 日），頁 1。關於《常熟日日報》的介紹，可參看常熟檔案館編，《常熟老報刊》（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頁 151-153。

從徐兆瑋的例子可以看到，在近代國家體制進入地方社會的過程中，士紳對於地方信仰所抱持的複雜態度。這種態度的形成，與地方資源的分配有所關連。地方教育會等行政機構的成立，實為士紳態度轉變的催化劑。

柒、結論

有學者提出，舊學士子通過各種途徑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地位。同時，亦能在清季政權向基層延伸的過程中，成為地方菁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掌控各種社會資源與重要位置。²⁰³ 就徐兆瑋個人的經歷看來，他所依仗的手段之一為通過教育會的運作，以保障其在地方社會中的地位。

教育會在地方社會中的角色，不只有教育行政功能，在一定意義上，也取代地方政治的部分作用。隨著科舉的廢除，傳統中國鑒別社會菁英的「傳訊系統」(signaling system)已經崩潰。²⁰⁴ 在清末新政中，為符合近代國家建設的需要，故以新式學堂「暫時」代替科舉的角色。由於其所需資源甚多，得由地方士紳協助管理。因此，雖然伴隨新政引進的各種制度使得地域社會出現明確的地域劃分，以致於出現城鄉對立的現象。²⁰⁵ 不過，某些制度的確立與地方士紳的自治傳統暗合，反而使得地方士紳的地位在新制度中得到保障。因此，士紳通過新式教育的建立，逐漸使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得到國家的認可。所以，教育會與勸學所等雖無運作地方政治之實，亦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的自治機構。與縣議會一樣，在維繫地方秩序上實有同樣的功能。民國初年中樞政權初成之時，其正當性雖曾受到衝擊。但是，由於其社會基礎穩固，遂使教育會仍能維繫其參與地方政治的強度。

在士紳而言，維持新式教育體系的運作，可保障其自身在地方社會上的權力

²⁰³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頁 225。

²⁰⁴ 參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3-88。關於「傳訊系統」，可參看林全、朱敬一，《經濟學的視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年），頁 77-82。

²⁰⁵ 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頁 384。

與話語權。他們必須保障地方社會能有足夠資源維持教育體系的正常運作。因此，他們仍得通過傳統的稅捐方式，以保證充足之稅賦與資源。這亦無形中符合傳統士紳在社會的收入來源。²⁰⁶ 隨著教育機構的革新，地方士紳在地方政治所著重之策略有所不同。但是，士紳的策略要操作成功，以避免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勢必要與地方社會和國家兩方有著更多之合作。因此，若能針對士紳如何以「新瓶舊酒」的形式來建構地方社會，應能對中央與地方之間關係的課題，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²⁰⁶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在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一書中指出：士紳得到收入的 5 個來源為：(一) 調解農民之間的法律糾紛；(二) 監督地方學堂與書院；(三) 監督水利工程；(四) 徵召與訓練地方武力以公開募捐來作為士兵之薪餉；(五) 包攬農民稅收以收取規費。見 Frederic Wakeman,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31.

徵引書目

一、日記、文集與憶述文獻

丁祖蔭，《丁初我日記》。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館藏稿本。

丁祖蔭，《丁初我雜著》。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館藏稿本。

徐兆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1-6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 年。

蔣維喬，《江蘇教育廳三年的回憶》。上海圖書館古籍部館藏稿本。

二、期刊、報紙

《申報》，上海，1913 年。

《神州日報》，上海，1908 年。

《常熟日報》，常熟，1916 年。

《常熟日日報》，常熟，1916 年。

《常熟旬報》，常熟，1912 年。

《虞陽報》，常熟，1912 年。

三、專書

《重修常昭合志》。常熟圖書館藏 1948 年刊本。

《常熟縣史地政治經濟社會概況總報告》，收入南京圖書館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情調查報告》，第 9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 5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王健，《利害相關：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

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統合と地域社会：立憲・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

- ト》。東京：研文出版，2010 年。
- 白凱著，林楓譯，《長江下游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鬥爭（1840-1950）》。上海：上海書店，2005 年。
- 江蘇省行政公署內務司編，《江蘇省內務行政報告書（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 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東京：研文出版，2013 年。
-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 李學昌主編，《20 世紀常熟農村社會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林全、朱敬一，《經濟學的視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年。
-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
-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1993 年。
- 高俊，《清末勸學所研究：以寶山縣為中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年。
- 常熟市水利志編纂委員會，《常熟水利志》。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90 年。
- 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常熟人物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年。
- 常熟縣公署編，《常熟縣三年間教育狀況》。常熟：編者，1916 年。
- 常熟檔案館編，《常熟老報刊》。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
-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
- 章開沅，《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
- 陳昀秀，《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 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 年。
- 朝倉美香，《清末・民国期郷村における義務教育実施過程に関する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5 年。
- 黃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
-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

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Rankin, Mary Backus, 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Faure, David,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keman, Frederic.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四、專書論文、期刊論文

〈專件：學部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四川官報》，第 20 冊（1906 年）。

〈報告：各縣風俗制度調查報告表（依部頒通俗教育調查第一表式）——常熟縣〉，《江蘇教育行政月報》，第 14 號（1914 年 6 月）。

小野寺史郎，〈地方史研究と王清穆日記〉，收入高田幸男、大澤肇編，《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口述・電子化・地方文献》。東京：東方書店，2010 年。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4 期（2013 年 6 月）。

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論歷史人物崇拜與寶卷講唱的關係——以中國江蘇省常熟縣的《千聖小王寶卷》為例〉，《興大人文學報》，第 50 期（2013 年 3 月）。

沈懷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1898-190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 期（1980 年）。

胡春惠、李道緝，〈袁世凱總統時代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收入國史館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9 年。

徐本堅，〈明清時期常熟城區的地理格局〉，《常熟史志》，第 7 期（2013 年 6 月）。

徐佳貴，〈晚清士紳與清末地方興學中的國家與社會——以浙江瑞安縣公立中學堂存廢之爭為例的考察〉，收入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

- 高田幸男，〈江蘇教育總會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駿台史学》，第 103 號（1998 年 3 月）。
- 高田幸男，〈清末江蘇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構築と教育会——江蘇教育總會による地域エリートの「改造」——〉，《駿台史学》，第 111 號（2001 年 2 月）。
-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著，張安琪、胡學丞譯，〈晚清及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的迎神賽會〉，收入康豹、高萬桑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
- 陳涵樹，〈清末民初常熟東境興學概況〉，《常熟史志》，第 7 期（2013 年 6 月）。
- 華貞，〈江蘇學閥之過去及將來〉，《中國青年》，第 6 卷第 7、8 期合刊（1926 年 8 月 31 日）。
- 虛白，〈曾孟樸先生年譜（中）〉，《宇宙風》，1935 年第 3 期（1935 年 10 月）。
- 樊樹志，〈江南市鎮的民間信仰與奢侈風尚〉，《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5 期（2004 年 9 月）。
- 鄧若華，〈現代化過程中的地方精英轉型——以 20 世紀前半期江蘇常熟為個案的考察〉，收入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 6 輯：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社會變遷〉，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五、工具書

-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第 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
- 徐復、季文通主編，《江蘇舊方志提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 常熟市文化局編，《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 學部總務司編，《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年。

六、網路資料

- 《常熟市志》，網址：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140227_1.htm。
- 「虞山閑情——ys18j 的博客」，網址：http://ys18j.blog.hexun.com.tw/86374046_

d.html。

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地方文献についての覚書〉，收錄於「東洋学研究情報センター」：<http://ricas.ioc.u-tokyo.ac.jp/asj/html/037.html>。